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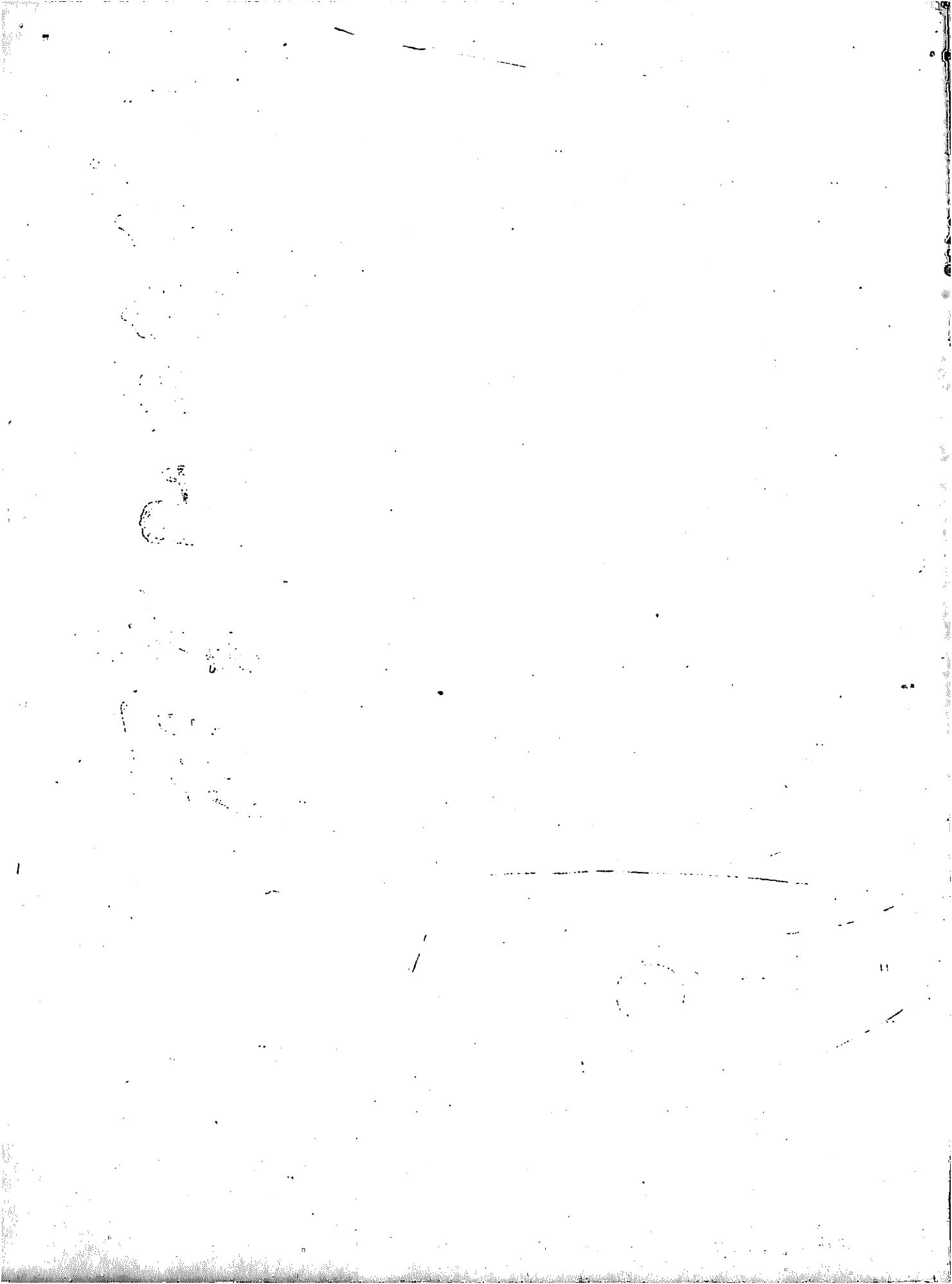
XUEXI YU PIPAN

学习  
与  
批判



1975

杨  
世  
泉  
五  
九  
廿  
三



##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目 录

###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 鲁迅论《水浒》 ..... ( 3 )
-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 ..... 翟 青 ( 4 )
- 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 魏永征 ( 11 )
- 论阮氏三兄弟 ..... 陈大康 ( 15 )
- 论晁盖 ..... 杜恂诚 ( 19 )

|                                   |                    |
|-----------------------------------|--------------------|
| 《水浒》改名的启发 .....                   | 徐震 (22)            |
| 宋江的“反诗” .....                     | 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 仲富兰 (24) |
| 青年工人谈《水浒》<br>——八月廿日座谈会的发言纪录 ..... | (25)               |
| 资料：《水浒》研究中各种不同意见的综述 .....         | (29)               |

## 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

### 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                            |                     |
|----------------------------|---------------------|
| ——学习《〈共产党人〉发刊词》的一点体会 ..... | 方海 (37)             |
| 要教育党员带头继续革命 .....          | 中共上海吴泾热电厂委员会 (40)   |
| 怎样把理论学习引向深入 .....          | (42)                |
| 学习信箱：定额制度也有资产阶级法权吗？ .....  | (46)                |
| 漫话私有制的起源 .....             | 康立 (48)             |
| 杂文 2-1=? .....             | 沪东造船厂船体车间“雄鹰”班 (54) |
| 没有想到 .....                 | 上港一区任慈杰 (55)        |

## 人物传记

|               |             |
|---------------|-------------|
| 鲁迅传(续四) ..... | 石一歌 (57)    |
| 赣南纪行 .....    | 吴文虎 曹溶 (70) |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  
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  
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  
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

翟 青

在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中，故事刚进行到一半，作者就让晁盖中箭而亡，使宋江得以坐上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水浒》为摒弃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而作出的情节安排，露骨地反映了它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政治意图。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中的晁盖和宋江，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分别代表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晁盖组织和领导了智取生辰纲的集体斗争，以实际的革命行动背叛了自己原属的地主阶级而投身于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他上了梁山后，和吴用、阮氏三兄弟亲密合作，消灭“进剿”的官军，屯粮、造船、操练人马，在巩固和扩大农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表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梁山泊农民起义大军的衷心拥护。晁盖在梁山泊所执行的这条路线，正如朱贵说的，“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或者如李逵说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它反映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势不两立的决心，表达了广大革命农民的意志和愿望。

宋江则不同。他是个满脑子儒家思想的地主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原先宋江视梁山为“不忠不孝之地”，曾经多次拒绝梁山好汉救他上山；但当他被迫上山成了事实后，一踏进聚义厅马上就变了调子，慷慨激昂地说：“感蒙众位不避刀斧，救援宋江性命”。他在晁盖面前，从不肯在公开场合提到“招安”二字，对晁盖装出了一副愿意“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的样子。他本心明明认为梁山造反行为是“灭九族的勾当”；但当李逵在梁山的庆喜筵席上公开说出“便造反，便怎地”的时候，也只是默不作声，伪装得十分巧妙。不仅如此，宋江还背着晁盖，在暗中搞了不少投降活动。他为了迎接朝廷招安，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对投降过来的将领彭玘、呼延灼、徐宁等人鼓吹：“只待圣主宽恩”，“专待朝廷招安”；一方面卑躬屈膝地对地主统治集团的宿太尉表白：“宋江原是郓城

小吏，为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你看，宋江不仅在梁山泊内部培植投降势力，而且居然大胆而无耻地干起里通朝廷的叛卖勾当来了。

《水浒》这部书，对前六十回展开的晁宋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如下的总结：“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这就是说，晁盖造反坚决，不忠不义，合该早死，应当让“早愿瞻依廊庙”的宋江来“把寨为头”，以便放手推行投降主义的路线。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水浒》第六十回以后的故事情节，就是宋江用忠君思想统治梁山，改造梁山，毁灭梁山革命事业的过程，也是宋江踏着农民起义军的血泊而一步一步地走进“廊庙”的过程：

第一步，宋江上台的第一天，立即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六十回）

第二步，宋江通过“英雄排座次”，把卢俊义等投降势力安插到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坚持晁盖路线的李逵、吴用、三阮、朱贵则受到排挤或贬低。（七十一回）

第三步，宋江在菊花会上，公开提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投降口号。（七十一回）

第四步，宋江在元宵夜亲自上京城，巴结皇帝的宠妓李师师讨招安的诏书。（七十二回）

第五步，宋徽宗第一次招安阴谋被粉碎以后，宋江亲自护送陈太尉下山，乞求他到皇帝面前美言几句。（七十五回）

第六步，宋王朝两次招安都没有成功，宋江感到“越增的罪恶重了”。打败童贯而不追，活捉高俅又放走，还向他们一再表白自己愿意归顺朝廷。（八十回）

第七步，宋江再派燕青、戴宗上京城，贿赂李师师和宿太尉，讨得了皇帝的诏书，使梁山泊全伙接受招安。

第八步，宋江投降以后，征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第九步，当宋江吃了宋王朝御赐的毒酒而快要死去的时候，骗李逵也服了毒酒，还高呼：“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这就是叛徒宋江在当了梁山泊寨主后所留下的一步一步的清楚脚印，直

到最后走进坟墓为止。他临死前自我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说“不肯半点欺心”是假，说“只主张‘忠义’二字”是真。从郟城县的“孝义黑三郎”，到忠义堂上“替天行道”的寨主，再到为封建朝廷尽忠的楚州安抚，宋江的一生都是围绕着“忠义”二字而进行其反革命活动的。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宋江，决不会忠于梁山的革命事业；搞修正主义的革命投机分子，最终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不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吗？

宋江所鼓吹的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在封建社会有着深厚的阶级基础。当农民革命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的人物被卷进了革命的洪流，其中包括不少人是从小封建统治营垒中投奔过来的。这些人在农民革命洪流的旋涡中动荡不定，有的经过改造后转变了立场，坚定地走上了农民革命的道路；有的则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从农民革命的对立面而来，最终还是作为农民革命的对立面而去。这后一种人，就是宋江在梁山泊内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基础，其中又进一步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宋王朝派来镇压农民起义被梁山英雄俘虏的投降将领，如关胜、秦明、呼延灼、董平等；一类是被宋江用计请上山来的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如卢俊义、李应等；一类是在地主阶级内部钩心斗角中遭到排挤后上山避难或谋求出路的，如柴进、戴宗、杨志等人。这些人既然都不愿意改变自己原来的反动立场，就很自然地结成一党，成为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支柱。诸如柴进、戴宗等人，为了替宋江讨得一纸诏书，冒着风险去闯京城，买“关节”。又如卢俊义，不仅和宋江一起里通朝廷搞招安，在招安后镇压农民起义时也和宋江一样地心狠手辣。最后，宋江路线越来越不得人心，连燕青也要退居山野的时候，卢俊义还训斥燕青道：“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宋江搞投降，正是依靠了这样一批人；而他们之所以拥护宋江，也正因为宋江所推行的这条路线代表了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

有投降派，就有反投降的人在。梁山上有许多好汉是不愿意投降的，李逵、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人就都是坚决的反投降派。他们出身贫苦，受尽了

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对梁山造反事业寄托了穷苦“百姓都快活”的崇高理想，十分痛恨葬送革命前途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在菊花会上一提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投降口号，李逵就愤怒地大骂：“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并一脚把桌子踢得粉碎。宋王朝派陈太尉来梁山招安，李逵夺过诏书，扯得粉碎，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直到招安以后，李逵还多次喊着：“反了吧！”“再上梁山泊去！”这就难怪宋江把他看成是“反心尚兀自未除”的人。再看看阮氏三兄弟，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对来梁山招安的陈太尉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不仅捅船漏水，使“天使”陈太尉狼狈不堪，还打开御酒和众水军痛饮，换上村醪水酒，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在宋江剿灭王庆班师回京途中，阮氏三兄弟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越来越感到恼火，便和李俊、张横、张顺等人商量立吴用为头。他们一齐对吴用说：“今请军师自做个主张；若和哥哥（宋江）商量，断然不肯。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李逵、三阮代表了梁山英雄的真正本色。他们的失败，是因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

出身知识分子的吴用，跟随晁盖造反多年，多年的斗争实践使他对晁盖路线怀有深切的感情。宋江一步步地改变晁盖的路线，他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并且多次巧妙地应付了紧急局面，一再挫败了宋江的阴谋。宋江勾结大地主卢俊义在梁山搞修正主义，吴用对此是有所警惕的。卢俊义一踏上梁山，宋江迫不及待地要尊他坐第一把交椅，李逵反对，武松不满，气氛十分紧张。吴用就提议：“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宾客相待。等日后有功，却再让位。”当头给卢俊义泼了一盆冷水。（六十七回）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宋江又劝大家推卢俊义为山寨之主。这时吴用抢先表态：“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兄弟，各依旧位。”宋江仍不死心，再以不负晁盖遗言为名，坚持己见，当他和卢俊义推让之时，吴用一面说：“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一面以目示意众人。果然李逵、武松、刘唐、鲁智深都一齐闹了起来，没有让卢俊义能够篡取最高权力。（六十八回）以后，在菊花会上，宋江要杀李逵，吴用以“一时醉后冲撞”来为李逵解围。陈太尉招安前后，吴用几次提出，要以武力对付朝廷，“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宋王朝第二次来寨招安，吴用又设计



让花荣一箭射死了正在宣读诏书的天使，使宋江的投降阴谋未能得逞。由于吴用和李逵、三阮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造反精神也不如他们足。特别是眼看宋江的投降路线日益得势，他就有些心灰意冷了，以至产生过“下效陶渊明之乐”的退隐念头。

从敌人营垒里分化出来的林冲、武松、鲁智深是另一种类型。虽然他们的经历和落草原因不尽相同，却都在梁山革命熔炉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比较坚决地走上了革命造反的道路。林冲面临高俅的种种陷害，开始只是逆来顺受，但血的教训使他逐步清醒过来，最后终于上了梁山。上山以后，他火并了不准别人革命的白衣秀士王伦，忠心耿耿地为晁盖路线服务。晁盖死后不久，在攻打北京城的战役中，反动军官关胜骄横不可一世，宋江却带头为他喝彩，这时林冲愤怒地说：“我等弟兄，自上梁山泊，大小五七十阵，未尝挫了锐气，今日何故灭自己威风！”当林冲再次直奔关胜杀去的时候，宋江又下令鸣金收军。这时林冲再次提出了抗议：“正待擒捉这厮，兄长何故收军罢战？”可见，他对宋江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态度是很恼火的。鲁智深、武松不仅反对宋江尊卢俊义为寨主的可耻行为，而且在菊花会上和陈太尉招安的两次斗争中，都挺身而出，站到了李逵一边。林冲、武松、鲁智深走向造反、反对投降的事实，不仅说明了宋江路线的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了革命熔炉是可以锻炼人，改造人的。

李逵、吴用、三阮等人虽然对宋江路线作过长期的斗争，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他们对宋江忠君的投降主义路线，从现象上、感性上看得比较多，但还不能深入认识到它的本质。这主要是由于被“义”字蒙住了眼睛。在晁盖时期，梁山的“义”本来是以“杀尽不平人”“砍尽不平事”为其主导面的，它一度曾成为联合五湖四海造反派的精神纽带。但是，它本身又包含有剥削阶级思想的糟粕，不可能真正作为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很容易被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投降派所利用。宋江一上梁山，就喋喋不休地说忠道义，说什么要“全忠仗义”，“忠义双全”，但梁山好汉们并没有对此及时引起警惕。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篡改和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这一字之易，标志着宋江按照“忠君”思想改造梁山农民起义队伍的开始。“忠”字已经摆到了“义”字之前，“义”字成了

从属于“忠君”的工具，但梁山好汉们也还是对此毫无半点察觉。

果然，宋江用服从于“忠”的“义”，严重地腐蚀和毒害了梁山的农民起义队伍。“义”象蒙汗药一样麻倒了许多响当当的英雄好汉。李逵手抡两柄板斧，在沙场上有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但他由于盲目地讲义气，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面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识不破宋江这个叛徒、内奸的真面目。在前面提到的菊花会上，宋江下令杀他，谁料到李逵会说出这样的话：“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直到全书的结尾，宋江用“义”调成的毒酒置他于死地，李逵也只是双泪长流地说：“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李逵死于一杯“义”酒而无怨，不禁令人惋惜和悲愤。这是多么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呵！再说吴用吧，也是吃了盲目讲义气的亏。当宋江投降嘴脸暴露无遗的时候，他还是不忍心和宋江决裂。在征讨王庆班师回京途中，阮氏三兄弟等人决心抛开宋江，要吴用带领大伙重新杀上梁山。吴用也动了心，但他看人重于看路线，竟然对阮氏弟兄们说什么：“自古蛇无头而不行，我如何敢自作主张？”他虽然也用“兄弟们都有怨心”劝过宋江回梁山，但宋江用“斩我首级”和“必当自刎而死”的话一吓唬，吴用也就不敢再作声了。直到宋江死后，吴用为了要“与仁兄同会于九泉之下”，最后竟自缢于宋江墓前的树上。李逵和吴用都死于一个“义”字，这种历史的悲剧，有力地说明了“义”的反动性。

宋江不是自称“呼保义”并且以“保义郎”自居吗？他究竟呼的是什么“义”？是聚义造反的义吗？不是。他根本不是农民革命的义士，而是地主阶级的义士。宋江呼“义”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忠君。他要在梁山泊内公开鼓吹忠君，是没有多大市场的。起义农民受尽了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怎么会去忠于地主阶级的头子呢？但他用义却颇能笼络人们去为他忠君。“义”象绳索似地把梁山好汉们捆绑得“如念珠子，竹连牵”那样，为了要讲义气，死生相随，大家也就只好跟着忠君的宋江跑了。保义，保义，最后“保”的是只能是忠君的投降主义路线。

一个忠字改变了农民起义大军的革命性质，一个义字象镣铐一般锁住了农民起义大军的手脚和灵魂，终于使他们从梁山之巅跌倒在紫禁城下，成为“忠”与“义”的俘虏。《水浒》的最后一回，作者又虚构了一个宋徽宗梦游梁山

泊的情节，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给宋江立“靖忠主庙”，还说什么老百姓敬祭宋江，“祈风得风，祷雨得雨”。你看，上自天子，下至百姓，中间还有《水浒》的作者，都在尽情地赞美和颂扬宋江了，宋江成了“忠义立身之本”的理想化身。《水浒》这样描写的本意，显然是要人们象宋江一样，搞什么“忠义双全”，但实际上倒是帮助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从反面懂得了：同反动统治者讲什么“忠”，同投降派搞什么友情为重的“义”，看人不分阶级，不看路线，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的失败。

通观《水浒》全书，它歌颂的是投降派，宣扬的是投降主义路线，鼓吹的是投降主义理论。但这部书好也就好在这里，它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早在建国初期，毛主席曾经针对当时思想文化界吹捧《武训传》以及武训的情况指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到了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再次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毛主席的这些极其深刻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阶级调和论的余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同《清宫秘史》《武训传》一样，《水浒》也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我们绝不能容忍对奴才武训的歌颂，也绝不能容忍对叛徒宋江的歌颂。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面目。我们应当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旗帜鲜明地反对奴才主义，投降主义，修正主义，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 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魏 永 征

一部《水浒》，从头至尾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不少人说，这反映了“农民的局限性”，是“典型的”“农民革命思想”。

果真如此吗？很值得怀疑。我们姑且先不说别的，就《水浒》论《水浒》吧。这部书除主要写了梁山泊起义军外，还提到了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农民起义军。但在他们的营盘里，不仅没有树起什么“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而且“改元建号，南面称尊”，公开同宋朝天子大唱其对台戏。即便在梁山的一百零八人里边，要反皇帝的也大有人在。起义军元老、旱地忽律朱贵早就宣称“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这显然不是他个人的随口之言，而分明是当时在晁盖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军的政治宣言。还有个黑旋风李逵，更是一再高叫“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把斗争的矛头牢牢地对准着皇帝。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典型的”“农民革命思想”，那末，晁盖、朱贵、李逵、田虎、王庆、方腊等人的反皇帝宣言，该称作是哪个阶级的思想呢？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农民的局限性”，那末，又是什么魔力使他们一千人超脱了这种“局限”呢？

把我们的思路拉开一点，想想整部中国农民革命史，问题就更多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反的是东汉王朝的“天”；“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冲”的是李唐王朝的“天”；比《水浒》成书稍后一点的李自成起义大军，直捣京都，致使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他们哪里是把自己的斗争“局限”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范围里头呢？历史事实证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绝对不是“典型的”“农民革命思想”。相反地，倒是李逵“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呼号，才是典型地反映了起义农民的革命性格。“夺了鸟位”干什么？李逵说：“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农民要取皇帝而代之，这样的“农民皇帝”，在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中屡见不鲜。这个历史现象本身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表现了农民在“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

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的情况下，不可能真正找到彻底地解放自己的道路的局限性，一方面又强烈地表现了农民同封建帝王、同整个封建统治势不两立的革命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不是仅仅反对某一个别分子或某一派别。如果反对地主阶级而不去反对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总代表——皇帝，这样，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了吗？

在忠于皇帝的前提下，提点反“贪官”、“奸臣”的口号，这在反动地主阶级营垒内部也是容许的。如果把这一点称之为“典型的”“农民革命的思想”，那末，海瑞、“包龙图”、“彭公”、“施公”和其他许许多多公案小说、公案戏中的主角，都可以称为典型的农民革命英雄了。“贪”啊，“清”啊，“奸”啊，“忠”啊，这些概念从何而来？无非是地主阶级内部各种派别斗争的产物。地主阶级内部总是你争我夺，钩心斗角。欲加罪于对方，为争宠于殿前，便把“贪”、“奸”之类的帽子飞来飞去。还是从《水浒》中取个例子吧。围绕着如何对付梁山起义军的问题上，宋朝最高统治集团就分成两派：一派是宿元景、张叔夜等人，主张“招安”；一派是高俅、童贯等人，主张“征剿”。“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水浒》是站在“招安”派一边的，于是就给“征剿”派扣了一顶帽子，叫做“奸臣”。其实，谁都明白，这两派在要扼杀农民起义这一点上毫无分歧，争执在于用哪把刀、哪根绳。只反高、童，实际上只是反对一种刀、一种绳，是宿、张之流的主张。而在起义农民看来，高、童、宿、张，哪个不“奸”，谁人不“贪”？怎么能把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斗争的思想口号来冒充农民革命的思想口号呢！

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口号，那末，一旦当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把它引入农民起义军内部，又必然幻化成投降主义的口号，请看宋江上山后，就是逐步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代替了晁盖的“与大宋皇帝作对头”的革命路线。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个“忠”字很能说明问题。忠于谁？忠于皇帝，忠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要提倡“忠”？宋江解释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赦罪招安，同心救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水浒》还在这段描写后特别强调了一句：听了宋江这段话，“众皆称谢不已”。这是作者在代表地主阶级感谢宋江劝说和蒙惑了一批农民起义军：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只是“贪官”和“奸臣”，而决不是“至圣至明”的天子。斗争的视线转移了，斗争的目的也改变了。农民起义军变成了“云开见日”，替天子拨开蒙蔽视线的“浮云”，才来反“贪官”。这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质已变成了“为了皇帝而反贪官”。接受了这个



口号，过去要与皇帝作对的革命队伍，实际上已经向皇帝缴械投降了。这倒没什么，其实，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要害在后半句，兑现的也只是这后半句。既然事实上所谓“贪官”和“清官”根本没有什么原则区别，那末，反与不反，争夺和勾结，也只能是捉摸不定的了。宋江“反贪官”，只是说给“众弟兄”听听的。在宋江全部“革命”生涯中，杀过的“官”总共只有一个，就是黄文炳。而黄文炳之可杀，也不是因为他作恶多端，仅仅只是因为他差点要了宋江自己的命。而在其他大小文武官员面前，宋江的态度则是奴颜婢膝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不说别人，就说那个梁山起义军恨之入骨的高俅吧，他兵败被擒，解到“忠义堂”上，宋江简直象见了亲老子一般，“亲解其缚”、“纳头便拜”。此时此地，高俅在宋江眼前无异是一个“青天大人”。昨日的“贪官”、“奸臣”，今日对自己有利了，就是“清官”和“忠臣”，这本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官场秩序的常见现象。对高俅尚且如此，世上还有什么“贪官”可反！可怜一支威风凛凛的农民起义军，被宋江带入了这样一条死胡同：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不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竟成了一无可反！

真的是一无可反吗？也不。既然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是死对头，那末，“不反皇帝”，就必然要反农民，反农民起义军。这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正是在梁山起义军逐渐被宋江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该反什么的时候，宋江把一批气势汹汹地来“清剿”起义军的反动官吏引进了起义军队伍。当他们的被农民起义军俘获后，很奇怪，只消宋江一席话，几个钟头前还在战场上生死相扑的仇敌，立刻在忠义堂上成了“同生共死”的“兄弟”。说怪也不怪，秘密就在于宋江向他们“亮”了个“不反皇帝”的“底”：“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待朝廷赦罪招安”，“那时尽忠报国”……这些气喘吁吁的败将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要他们投降宋江，而是宋江要投降他们，不是要他们参加农民起义军，而是请他们来夺农民起义军的权！连年征战、损兵折将所得不到的东西，现在竟现成地送到了手边，这是地主阶级里的死硬分子也会举起双手拥护的。于是，诸如呼延灼、彭玘、韩滔、关胜之流，一个个钻进农民起义军的肝脏，窃取了领导权，最后终于使梁山领导集团“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到这时，即使没有以后的招安仪式，实质上起义军也已被“整编”进了封建朝廷的御林军。宋江们在无声无息之中替皇帝消灭了梁山起义军。招安以后，这支变了质的队伍就去打方腊，这是必然的。方腊在反皇帝，你不去打，不也是反皇帝了吗？何况现在将领中有的“征剿”起义军的老手。别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破绽百出，到了“只反农民，不反皇帝”这一步，不就功德圆满了吗！

这不是几个口号的演变，而是一个口号逐步暴露其实质的必然过程。我们

只要看看另一本反动小说《荡寇志》，对这个过程就可以更清楚了。这本书的作者俞万春，一个亲手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给梁山一百零八人设计了一个斩尽杀绝的结局，真可谓是反动气焰满纸页了。但这部书中消灭梁山农民革命的头号“功臣”陈希真，其实也是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起家的。他也曾被“奸臣”、“贪官”所害，被迫“落草”，反起“奸臣”、“贪官”来，比《水浒》中的宋江还要着力。后来接受招安，踏平梁山，活捉宋江；“奸臣”高俅、童贯们也相继败亡。据说《荡寇志》是《水浒》的对立面，但是只要掩卷一想，其实并无多少不同。不同的只是姓名：《水浒》中的宋江，在《荡寇志》里叫陈希真；《水浒》中的方腊，在《荡寇志》里则叫做“宋江”。如果“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果真是“典型的”“农民革命思想”，那末，陈希真不也应尊为农民革命英雄了吗？

《水浒》中宋江有一句诗：“敢笑黄巢不丈夫”。他“笑”黄巢什么？大概也就是笑黄巢不懂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以由此发展到“只反农民，不反皇帝”，从而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自己的功名。但是，尽管他笑吧，对他这种破坏农民革命的地主阶级反动逻辑，黄巢等农民革命领袖将永远坚决唾弃。即便在《水浒》里，不说宋江招安时遇到过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反投降派的多少次反对和斗争，就说招安后非去“征剿”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起义军不可一事，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有许许多多其他农民领袖象黄巢一样，宁愿斗争不屈而死，不愿屈膝投降求生，他们的英勇行为不但彻底地批判了宋江的这种反动逻辑，而且也彻底地粉碎了那种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说成是“农民局限性”的弥天大谎。

歌颂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作为，实际上正是在取笑和贬斥中国历史上无数“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农民革命者。能容忍这种现象吗？伟大的鲁迅提出了反对。他明确地把宋江一类“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的家伙，愤怒而轻蔑地称之为“奴才”，那末，“奴才”的对立面——真正的英雄是谁？不言而喻，正是那些“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正是那些与以皇帝为总头子的地主阶级拚斗至死而毫不屈服的农民阶级的优秀儿女们。只有他们，才推动了历史车轮滚滚前进。

一切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类投降论调辩护的种种修正主义观点，早该是批判和清除的时候了。鲁迅在几十年前的批判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在批判古代投降派的过程中，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肃清刘少奇、林彪一类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从而进一步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 论阮氏三兄弟

陈大康

俗话说，“逼上梁山”。从一部《水浒》来看，确实如此。

但是，同样是逼上梁山，各种人的情况很不相同。其中有的是由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犯了人命官司而逼上梁山的，如鲁智深；有的是由于个人受到迫害，“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而无可奈何上梁山的，如林冲；有的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失败后被迫投降，如关胜、呼延灼；有的是被宋江硬“赚”上山的恶霸大地主，如卢俊义；还有的在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争斗中失败而被迫上梁山的，如宋江。他们尽管都是从统治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但上梁山后，表现各不相同。有的斗争比较坚决，如鲁智深、林冲；有的则身在梁山，心向宋廷，时刻盼望招安，如关胜、卢俊义等。特别是宋江，“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在梁山起义军中贯彻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是革命营垒中可恶的蛀虫。

另一类人和上述各种人都不相同。他们或者是出身于当长工的贫苦农民家庭，如李逵；或者是出身贫苦渔民，如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他们由于受着封建统治的压迫，对地主阶级怀有深仇大恨。他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阮氏三兄弟原在梁山泊附近石碣湖里打鱼过活。据《水浒》中的描写：阮小二“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而阮小七则是“头戴一顶遮日黑笠，身上穿个棋子布背心，腰系着一条生布裙”。从这些破旧的衣着上，就可知道他们过的是贫穷悲惨的生活。在当时，阮氏三兄弟要在水泊里打鱼，就免不了沉重的“若干科差”，而“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阮氏三兄弟在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下，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认识得比较清楚，反抗的要求也就特别强烈。他们听说梁山上有好汉在聚义，便十分羡慕这种“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战斗生活，说是“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在这里，可以看出三阮和宋江的立场根本对立：宋江标榜的是“替天行道”，即替当今的天子行孔孟之道；而三阮则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对皇帝、地主、封建官府都丝毫不放在

眼里。阮氏三兄弟的革命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对梁山早就心向往之，兄弟三人曾“几遍商量要去入伙”，只是当时在梁山上掌权的是白衣秀士王伦，素以气量狭小、妒贤忌能著称，实行了一条关门主义的路线，这才使得阮氏三兄弟“一齐都心懒了”。他们渴望能有个真正的农民革命领袖来带领他们，曾经对吴用表达了这样的决心：“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因此，当吴用来争取他们入伙、共谋夺取生辰纲时，就立即得到了兄弟三人的热烈反应和全力支持：“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正是搔着我痒处！”他们对革命是何等热烈地向往啊！

阮氏三兄弟跟着晁盖、吴用智劫生辰纲后，在石碣村湖泊巧设奇兵，大破官军，活捉何涛，未上梁山就立下了大功。阮小二痛斥何涛说：“休道你是一个小小州尹，也莫说蔡太师差干人来要拿我们，便是蔡京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态度何等鲜明，立场何等坚决！这一席话可以说是阮氏三兄弟的气壮山河的造反宣言。

上了梁山，革命了。但起义军内并不象阮氏三兄弟原先想象的那样，只是过着“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这倒不是指的要和官兵接仗，阮氏三兄弟对这种战斗生活是思想上早有准备好了的。问题复杂在梁山起义军内部还有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刚上梁山，阮氏三兄弟就在晁盖领导下与王伦的关门主义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到了宋江上梁山后，山寨里坚持斗争和鼓吹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就更是激烈地展开了。

阮氏三兄弟等跟随着晁盖出生入死，去江州救出了宋江，把他接到山寨坐了第二把交椅，实指望他能带领众弟兄奋勇杀敌，巩固和发展梁山的起义事业。但宋江上梁山后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搞的不是革命，而是投降主义。由于当时主持山寨的是晁盖，不少革命头领也都拥护晁盖所贯彻执行的这条坚持斗争的路线，宋江自感时机尚未成熟，从不敢在晁盖面前提起“招安”二字，但他背着晁盖却到处刮阴风、点鬼火，从没有一天停止过争取“招安”的活动。同时，他为了替日后投降作准备，在梁山上实行了一条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上自封建王朝的高级军官、大庄园主，下至流氓、恶霸、地头蛇，通通被他拉上山来窃据要职，握有重权，而紧跟晁盖革命路线的革命将领如阮氏三兄弟等，却备受压制，兵权日削。经过几年间惨淡经营，宋江羽翼已成，气焰日高，投降势力就开始在山寨中抬头了。晁盖在攻打曾头市时说：“我不自去，谁肯向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这时晁盖的指挥已经不大灵了。

梁山上这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很自然地波及到水军中来。对水泊梁山来说，水军是一支极其重要的军事力量。在宋江上山前，这支部队在忠于革命的阮氏三兄弟率领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骁勇异常，屡立奇功，为保卫革命的根据地建树了不朽的功勋。宋江是个善于篡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对这块重要阵地岂肯轻易放过。他上山时带来了三个心腹知交：李俊、张横和张顺。李俊是揭阳岭上一霸，张横与张顺是浔阳江上一霸，都是地头

蛇，张顺还兼做江州城的“鱼牙主人”，又是个渔霸。这些人在地主阶级内部受到排挤打击时，有可能倾向革命，应当承认他们在参加农民革命后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他们与贫苦渔民出身的阮氏三兄弟比起来，无论从革命态度的坚决或是对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来看，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李俊对山寨无尺寸功劳，可他一上山，宋江就把他的座位置于屡建大功的阮氏三兄弟之上。当时名单上公布水军头领的位置是：李俊、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张横、张顺。阮氏三兄弟对革命忠心耿耿，对敌人刻骨仇恨，他们本能地反对“招安”，反对宋江的投降路线，自然也就遭到了宋江的厌嫌。晁盖在世时，宋江出征时总要把李俊、张横和张顺等水军头领带在身边，而让阮氏三兄弟留在山寨。只有在宋江攻打祝家庄失利后，吴用带兵前去增援，阮氏三兄弟才得跟随吴用下山出征。宋江这种拉一派、打一派的恶毒手法，在梁山将领中起着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的作用，加剧了水军头领间的不和和分裂。当关胜围攻梁山泊时，宋江带兵在外，水军头领奉命留守。这时张横私下对张顺说：“我和你弟兄两个，自来寨中，不曾建功。只看着别人夸能说会，到受他气。”这个“别人”是谁？从张氏兄弟背着阮氏三兄弟自行去偷营这件事，可以推知是指的阮氏三兄弟。后来张氏兄弟偷营失利，张横被擒。张顺来到阮氏三兄弟水寨中诉苦。阮小七一听，立即跳将起来：“我们兄弟们同死同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亲兄弟，却怎地教他独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兄三个自去救他。”看，阮氏兄弟是何等地维护山寨的团结；而张氏兄弟却在宋江的错误路线影响下，怀有私心，不能很好地顾全大局。阮氏三兄弟救援的结果，因寡不敌众也遭到了失败，“张顺见不是头，扑通的先跳下水去”，而阮小七则被关胜捉去了。关胜提审阮小七与张横，阮小七大义凛然地痛斥关胜，而张横在旁却不吭一声。有比较才能鉴别。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两人对农民革命事业的忠诚程度的不同。

《水浒》的作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起义，在第六十回上就让晁盖中箭身亡了。晁盖一死，宋江上台。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正晁盖的革命路线，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亮出了“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旗帜。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晁盖的革命路线的头领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排挤和打击。尽管阮氏三兄弟生擒了轰天雷凌振，又活捉了连打梁山“一十五员大将”的没羽箭张清；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水军头领的位置却是，李俊、阮小二、张横、阮小五、张顺、阮小七。看，阮氏三兄弟的位置，又在往后挪移了。这石碣文明明是宋江玩弄的阴谋诡计，宋江却偏要解释说：“上苍分定位数……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尽管宋江嘴里这样说，可只过了几天，宋江公布的水军头领的位置却又赫然是，李俊、张横、张顺、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梁山根据地创建初期，阮氏三兄弟的位置在前十名之内，可是到了这时，他们却越来越往后挪，被挪到第三十名左右。至于那些被迫投降的封建王朝的军官，如关胜、董平、张清、索超诸人，却平步青云，位置远远地排到阮氏三兄弟的前面去了。宋江的这条组织路线，完全是为着自己政治上的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



阮氏三兄弟遭到了排挤，但他们反对投降的斗争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削弱。皇帝派陈太尉来梁山“招安”，宋江得知，“心中甚喜”，可前去接陈太尉的阮小七，却偏让“天使”乘坐漏船，使陈太尉狼狈不堪，出尽洋相。阮小七还与众水军将六瓶“御酒”吃得一干二净，在空瓶里装上村醪水酒。当陈太尉神气活现地请众头领吃“御酒”时，“忠义堂”上一见是村醪水酒，立即大乱，众头领反将起来，陈太尉几乎性命难保，包括阮氏三兄弟在内的水军头领也“骂下关去”。宋江这次的“招安”计划就这样地破了产。

宋江接受“招安”后，阮氏三兄弟仍没有停止过对宋江投降路线的斗争。梁山好汉们征王庆回来，朝廷出榜文，禁止他们“擅自入城”。这时，阮氏三兄弟等水军头领就请吴用来到船中并对他说：“朝廷失信，奸臣弄权，闭塞贤路。……今请军师自做个主张；若和哥哥商量，断然不肯。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这段话，充分地表明了阮氏三兄弟打算重新扯旗造反，踢开宋江闹革命了。在这次事件中，水军头领们是一致行动的。李俊、张横、张顺等人尽管深得宋江信任，但在封建王朝的迫害下，在阮氏三兄弟革命精神的鼓舞和带动下，对宋江也已渐有不满，准备反将起来了。宋江觉察到此事，立即召集众头领搞了次“忠”“义”说教，虚伪地以自杀来作威胁，由于“义”字蒙蔽了梁山弟兄们的眼睛，“众人听了宋江之言，俱各垂泪设誓而散”。阮氏三兄弟的革命计划就这样地遭到了宋江的扼杀和破坏。

宋江投降后，起劲地为宋王朝镇压农民起义。在攻打方腊时，梁山军屡屡失利，众头领纷纷阵亡，阮小二也在乌龙岭下自刎身死。在《水浒》作者的恶毒安排下，让阮小五、阮小七受着狭隘的“复仇”观念的驱使，为了报杀兄之仇，红着眼睛去和方腊的起义军火并。其实，方腊起义军根本不是阮氏兄弟的仇人而是他们的阶级兄弟；而那个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搞投降路线的修正主义头子宋江，才是他们的真正仇人。《水浒》的末尾中，阮小五也不明不白地战死了，只有阮小七一人算是幸存了下来，结局十分凄凉。

尽管《水浒》作者为了突出宋江而对阮氏三兄弟作了种种歪曲，但毕竟是从反面保留下了一定的材料。阮氏三兄弟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业绩，受到了广大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怀念和赞扬。陈忱作《水浒后传》，写阮小七重上梁山造反，这可以说是符合阮小七性格的逻辑发展的。后来，根据《水浒后传》的故事敷衍而出现了京剧《打渔杀家》，戏中的萧恩，据说是阮小七的改名。可是在《打渔杀家》里，阮小七已非昔日威风，而是散兵游勇、溃不成阵了。尽管父女二人杀死了丁员外、葛先生和教师爷而扬舟他去，但究竟又能到哪儿去避难呢？又怎样能冲破封建统治阶级压迫的罗网呢？由此，我们可从中更深刻地看清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给农民革命事业所造成的罪恶有多大。暗藏的敌人比公开的敌人更凶恶，不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势必会使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导致崩溃和失败。这个惨痛的教训，值得革命的人民永远记取。

# 论晁盖

杜恂诚

晁盖是梁山起义农民的领袖，但在《水浒》中却被摒弃于一百零八人之外。

其实，晁盖对梁山事业是作过很大贡献的。他一上山，就纠正了王伦的关门主义路线。晁盖首先提出了明确的起义纲领，那就是“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八个字。“聚大义”就是号召广大被压迫的农民走革命造反的道路。晁盖等七人在劫生辰纲前设誓说：“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他们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称之为“不义”，而把他们自己的反抗称之为“聚义”，阶级立场是何等地鲜明！因此，晁盖为梁山提出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口号，在政治上对革命农民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晁盖在起义军内部提倡平等，彼此以兄弟相称。他把劫得生辰纲和自己的财物分给大家，又妥善安顿了各家老小，因此深得众人的拥护。晁盖很善于用人，根据各人的特长分配工作，遇事同大家商量，很有民主作风。晁盖还为起义军制订了严格的纪律。他不杀俘虏，爱护老百姓，就是对富商也规定只取其财物，不准伤人性命。梁山起义军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使起义军深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晁盖在军事上也采取了许多主动积极的措施：修理寨栅，打造军器，建立水军，每日操练兵马，随时准备和官军作战。

“一从火并归新主，会见梁山事业新。”由于晁盖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农民起义路线，所以梁山事业蓬勃发展，对官军作战屡战屡胜，起义军的军威大振。众好汉纷纷聚义上山，到攻打曾头市时，在农民起义军中形成了一支坚强的骨干队伍。晁盖死后，宋江篡夺了水泊梁山的领导权，推行的则完全是一条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宋江新发展的近二十名头领，大多是忠君思想很严重的旧军官和大地主，如卢俊义、关胜之流，他们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得力帮凶。

早在梁山聚义之前，晁盖在江湖上声望已经很高，所以宋江很巴结晁盖，和他结为“心腹”之交。可是晁盖在物色义劫生辰纲伙伴的时候，对吴用推荐的阮氏三兄弟立即表示同意，却连提都没有提到宋江。不仅如此，晁盖在打劫生辰纲时，对宋江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不露一丝口风，怀有很深的戒心。这是因为晁盖知道宋江是一个满脑袋忠君臣宦思想的人，不可能跟起义农民结成一伙，告诉了他反而会拖后腿、添麻烦。由此可见，晁盖和宋江的所谓“心腹”之交，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江湖义气的维系，在思想上却是两股

道上跑的车。后来宋江知道了劫生辰纲的事，果然大惊失色，认定晁盖是“犯了弥天大罪”。他所谓的“弥天”，就是指触犯了封建统治，那还得了！这说明晁盖是颇有知人之明的。

宋江为了克尽地主阶级的孝道，撇下投奔梁山的清风山起义军，回到他的地主庄园里安居过日子。他的父亲宋太公对他说：“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为此，急急寄书去唤你归家。”这一番庭训使宋江拜伏在地，抛弃了上梁山的念头。当官府因宋江杀阎婆惜的事而把他抓起来时，他对父亲说：“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好一个尽忠尽孝的安份臣民！所以当晁盖在他发配江州的路上，把他和两个押送公人截住，请他上山聚义的时候，他十分恼火，说这是要陷他于“不忠不孝之地”，他决不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别人要替他打开枷锁，他却说什么“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完全是一副十足的奴才相。晁盖等人再三规劝他，他执意不从，一会以自杀相威胁，一会又大哭大闹，躺到地上撒赖打滚。宋江这番淋漓尽致的表演，使晁盖和众好汉寒了心。从此，晁盖对宋江的认识就又加深了一层。

可惜的是，晁盖太讲“义气”。由于宋江在智劫生辰纲事案发后曾给他通风报信过，所以尽管他对宋江的忠君思想十分反感，当听说宋江遭了难，他还是带了人马到江州劫法场把宋江救了出来。这时的宋江知道朝廷决不会马上宽恕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勉从梁山暂栖身了。晁盖指挥起义军打败了江州无为军，李逵高兴地说：“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这是宋江连做梦都不敢想到的，但碍于晁盖，也就不便对李逵发作。他的勉从起义军，是想以此作为本钱，求得皇帝的“招安”，将来捞个一官半职，也好光宗耀祖。而晁盖听了李逵的话，却非常高兴，默许地和众英雄笑了起来。晁盖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很有政治抱负，他既反对官府，又反对皇帝，在他身上体现了农民革命的彻底性。晁盖坚决造反的路线和宋江醉心“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根本对立的。这正是《水浒》作者不满意晁盖的关键所在。《水浒》作者在七十一回把晁盖和宋江作了对比：“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两种态度，十分鲜明。晁盖的雄心是推翻整个封建王朝，以农民政权来取而代之，而宋江的“呼群保义”，保的是所谓“忠义”，正如他发誓所说：“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原来他的“呼群保义”，就是接受“招安”，投降宋朝。晁盖和宋江分别代表了两个对立的阶级，两种对立的思想和两条对立的路线。

在如何看待农民起义军的态度上，晁、宋两人也截然不同。晁盖识大体，顾大局，处处以农民起义的整体利益为重。江州一战，他身先士卒，叫道：“一不做，二不休！众好汉相助替晁某，直杀尽江州军马，方才回梁山泊去！”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可是，当宋江要动用梁山人马给他报私仇时，晁盖马上表示反对冒险。他说：“我们众人偷营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贼，已有提备。”尽管他“义气”很重，他还是把起义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宋江刚上梁山，又提出要回家搬取老小，晁盖又表示反对，说：“众弟兄们连日辛苦，

寨中人马未定”。意思就是不能为了你宋江一个人的家小，让起义军受累。这体现了农民起义领袖的可贵品质。宋江与晁盖的态度截然相反，完全把梁山起义军当作他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弱点，以江湖“义气”笼络人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鼓吹“忠义”，在起义军内部形成了一股反动的逆流。他排挤革命最坚决的起义将领，如李逵、三阮兄弟等，把他们在山寨中的地位越压越低；而把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革命不坚定分子安插在各种要害岗位上。宋江忌于晁盖革命的坚决，不敢公开打出受“招安”的投降主义旗号，却千方百计排挤晁盖，遇事总是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以这个名目明捧暗挤，一步步地夺晁盖的权。到攻打曾头市时，宋江的势力已很大，晁盖已经无法指挥全局了。晁盖在决定他自己亲自去劫寨时，无可奈何地对林冲说：“我不自去，谁肯向前？”晁盖作为梁山泊的一个主将，应当指挥全局，不一定每一仗都要亲自上阵。但鉴于当时手下很多将领受了宋江的拉拢，对晁盖指挥的战斗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不肯奋力向前，晁盖就不得不自己去打冲锋。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晁盖是死于史文恭的毒箭，倒还不如说是死于宋江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当宋江刚上山的时候，晁盖为了感激宋江冒险到东溪村通风报信的义气，曾经一再推让宋江为山寨之主。但是，经过长期观察以后，晁盖的态度逐步起了变化，在实践中越来越感到宋江靠不住。他临死前最担心的就是怕梁山起义要坏在宋江的手里。因此，他当着将领们的面对宋江立下这样的遗嘱：“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按理，宋江是梁山的二头领，是当然的继承人，可晁盖偏偏要让捉住射死他的人做梁山泊主。宋江武艺平常，打仗总躲在阵后，哪里能捉得住武艺高强的史文恭！晁盖的遗嘱如果换一种直截明白的方式来说，那就是：“我反对宋江做梁山泊主！”果然，晁盖一死，宋江便搞修正主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晁盖囿于江湖义气，所以他在跟宋江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时，表现得不够坚决。从遗嘱一事，也可以看出他既想坚持原则又怕伤了“义气”的矛盾心理。他提出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革命口号缺乏明确的阶级概念，以致被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宋江在“义”字上钻了空子，改变了“义”的阶级内涵，为他一己的结党营私、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服务。《水浒》的作者为了在《水浒》中宣扬投降主义，对晁盖十分嫉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对宋江则温情脉脉，百般歌颂和美化。他竭力贬低晁盖，用以抬高宋江。但也正因如此，《水浒》证明了它自己是一部反面教材，使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投降派，这些投降派是怎样破坏革命事业的。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尽管《水浒》的作者用心良苦，对晁、宋两人进行了颠倒的叙述和描写，但千百年来，民间百姓仍然喜爱晁盖而厌恶宋江，认为前者伟大而后者渺小，前者高尚而后者卑鄙。因此，晁盖毕竟不愧为农民起义的英雄，而宋江只能是遗臭万年的叛徒。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 《水浒》改名的启发

徐 震

三十年代中期，一个名叫布克的美国女传教士，把《水浒》译成英文，并改书名为《人皆兄弟》。这个美国女人，象当时有些标榜“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一样，是个生在中国并在中国呆过相当时期的所谓中国通。她曾经写过几部以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还取了赛珍珠这样一个中国名字。这个资产阶级作家，在翻译了《水浒》以后，自以为深得这部书的精髓，于是乎改了书名，很明白，那是取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意思。

这样地来为《水浒》改名，比起金圣叹靠腰斩《水浒》后又生造一个嵇叔夜之类的露骨做法，既不着痕迹，又能迷惑群众，手段可以说是略高一筹。一部《水浒》，从少华山上朱武等人结拜兄弟开始，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一百零八人，出身不同，经历各异，得以粘结在一起，这“兄弟”两字确是起了一点胶合的作用。书名：“人皆兄弟”，谁曰不宜？

然而，在阶级社会里，其实是找不出不上阶级烙印的兄弟关系的。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上阶级的烙印。”即使是真兄弟、亲兄弟，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时候，还不是照样斗得不亦乐乎。什么兄弟阋墙，豆其相煎，历史上这类记载可实在是太多了。辛稼轩在他的《最高楼》这阕词中有这样两句：“人间朋友犹能合，古来兄弟不相容。”不是吗？清朝的雍正通过剧烈的争夺做上了皇帝，其他的兄弟被杀的杀，关的关，甚至连名字也要被改成阿思那（猪）和塞思黑（狗）。亲兄弟尚且如此，何况是所谓“义兄弟”呢！

对兄弟称呼一定要作阶级分析。历史上，革命队伍中确实也有把兄弟称呼作为一种平等观念，来团结内部并对抗统治阶级的等级压迫的，如太平天国中的某些人们。但其作用大抵也仅至于此了。更多的却是另一种人，在“兄弟”的幌子下干着出卖兄弟的勾当。我们就以《水浒》为例吧！别看那忠义堂上大碗吃酒肉，论秤分金银，一般兄弟相称，好象很是平等。其实，在“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下，还不是壁垒分明，等级森严，钩心斗角，同床异梦，哪里有什么“兄弟怡怡”的景象！比如那个做梦都在想招安的宋江，他对那些归降的统治阶级中的头面人物，推崇备至，才一解缚，立即推心置腹，互诉“归附朝廷”的衷曲；而对那个革命坚决、作战勇敢而又搭救过他性命的李逵，却动辄呼来喝去，从来就没有平等相待过。在李逵和宋江的关系中，李逵真是悲剧人物。从他们两人身上也最可以看出所



谓的兄弟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了。李逵在江州为了搭救宋江，不惜赤膊上阵，抡起板斧，火杂杂地大闹法场，以身相搏。他对这位“宋公明哥哥”实在称得上是一腔忠心，执鞭随蹬，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在所不辞。要说“兄弟情谊”和“江湖义气”，他之于宋江实在也可以算是到了家了。然而在宋江坐第一把交椅的梁山泊内，李逵何尝有什么发言权，更谈不上是一个决策人物了。他除了打仗拚命和不断地上当受骗之外，如有“杀去东京”之类的倡议，那就立刻被宋江辱骂、撵逐甚至要“斩讫报来”或“权寄头颅”，直到最后，他还终于不得不把自己的一条性命交给这个曾经被他搭救过的“哥哥”来亲手虐杀。呜呼！这样一个农民革命的英雄，最后落得个如此悲惨的下场，何也？就李逵这方面说，吃亏就吃在惑于“兄弟关系”，看不破宋江这个内奸的真面目，眼不亮，心不明，是个糊涂人，这正是李逵的阶级局限性。在那个时代，当然不可能象《杜鹃山》里那样，有柯湘这样一个共产党人来指明革命的道路，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李逵只能有李逵悲剧下场的社会根源。从宋江那方面来说，身边明放着一个口口声声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人，这对他推行那条投降、招安的路线，当然是眼中钉、肉中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从来没有什么折衷调和的余地。那怕你李逵“宋公明哥哥”叫得震天价响，只要你不改变“与大宋皇帝做对”的路线，那末你李逵总有取死之道。事情的结局也正是这样。

在梁山泊内，李逵尚且如此，其他想造反而与宋江路线相左的人，在软硬兼施之下，其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什么“兄弟情谊”“江湖义气”，透过这层含情脉脉的纱幕，就是这样一个残酷无情的阶级关系。这似乎应该是极明白的。

用超阶级的幌子来掩盖阴谋诡计，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手段。这手段宋江可说是玩得很精熟了。当代的勃列日涅夫之流，也学得颇为到家。他们一面亲亲热热地喊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关系”，一面又炮制“有限主权论”，把坦克车开进“兄弟国家”实行占领。版本是一个，不过笔法稍为拙劣一点而已。中国的蒋介石，也颇懂得袭用这套老谱，靠着青红帮的“兄弟关系”而踏着革命人民的尸体一步步爬了上去。

赛珍珠的改《水浒》为《人皆兄弟》，不管她本人的用意何在，客观上只能是妄图愚弄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李逵式人物，使他们沉湎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心理状态之中，而看不到从营垒内外杀过来的软软硬硬的刀子。但是，这毕竟是反动阶级的主观愿望，就在当时，也早有人识破了机关。译本出版不久，共产主义者鲁迅就在一封书信中言简意赅地评道：“……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不作兄弟看，就只能作阶级的一分子看，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因此，从《水浒》改名所得的启发是：凡事得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分析。

今天，《水浒》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水浒》式的义气却至今仍萦绕着一些人的头脑。然而，《水浒》式的义气，是为《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在今天深思的。

# 宋江的“反诗”

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 仲富兰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江在浔阳楼上酒后题的这几句半是牢骚、半是大话的反诗，被后来的许多《水浒》的研究者们奉为至宝，什么“农民革命领袖不满封建统治的强烈呼声”啦，什么“冲向封建王朝反动统治的匕首”啦，几乎把宋江快捧上天了。

宋江题的是反诗吗？这一点就连他本人也不承认。黄文炳抄了这首诗去报给蔡九知府，戴宗找宋江问道：“哥哥，你前日却写下甚言语在楼上？”宋江回答：“醉后狂言。”宋江被抓到蔡九知府处严刑拷打时，也只招道：“自不合一时酒后误写反诗，别无主意。”最后，在梁山泊好汉杀了黄文炳后，宋江仍只是说：“不想小可不才，一时间酒后狂言，险累了戴院长性命。”左一个“醉后狂言”、右一个“酒后误写”，这就是宋江自己对这首诗的注脚。

有比较才能鉴别。宋江不是“敢笑黄巢不丈夫”吗？那就不妨把两人比较一下。黄巢是我国历史上唐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他在揭竿造反时也曾经写过一首反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看，这两首诗是何等地不同！黄巢借菊花抒发自己的壮志，喻“百花”为反动统治，“我花开后百花杀”，豪迈地表达了农民革命领袖决心同封建统治者血战到底的决心。但是，宋江的诗中，却是自贱和怨恨的心情并存：自豪的是自己自幼学儒，颇有“权谋”；怨恨的是自己犯了大宋王朝的“法度”，“功又不成，名又不就”。无怪乎他在写这首诗时要“潸然泪下”。怎么办呢？只有“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心甘情愿地接受刺配江州的处罚。当吴用、刘唐等人要他上山时，他说道：“这个不是你们兄弟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在他看来，当一个囚徒要比当一个“匪徒”强，当个囚徒，还有“限满归来”之日，而上了梁山当了“匪徒”，那可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他完全把自己的命运同宋王朝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一起。黄巢的诗是农民革命英雄的响亮呐喊，而宋江的诗只能说是地主阶级内部争斗中“饿狗”的哀鸣。

其实，宋江的“凌云志”说也可鄙。他曾对武松这样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擢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原来，他的“凌云志”不过是接受招安，向地主阶级投降。他的“敢笑黄巢”，是“笑”黄巢为农民革命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 青年工人谈《水浒》

——八月廿日座谈会的发言纪录

许文宝(上海造纸机械厂)：《水浒》这部书宣扬投降主义，表现在各个方面，集中一点，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这一点在《水浒》中随手翻翻就能找到。诺，这儿是第五十八回，讲到宋江捉住了进剿起义军的呼延灼，他立即替呼延灼解去绳索，亲自扶上帐去坐，虔诚拜见。这一手连呼延灼也奇怪了，问道何故如此，宋江连声谢罪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每次抓住一个朝廷官员，他都当作向朝廷表忠心的一个机会，把官员当作“信使”。看上去是在莫名其妙地拜这个军官，拜那个官员，实际上是一次次向朝廷、向皇帝顶礼膜拜。

宋江一生讲过许多假仁假义的谎话，只有在见到朝廷官员的时候，才“披肝沥胆”，直表心迹。这里他说“权借”水泊，是真话。参加农民革命军对他来说，确实只不过是“权借”一下而已，天天想着投降，目的是借此机会为朝廷组织一支特殊的御林军，用农民革命来绞杀农民革命。

宋江遇见了呼延灼，是如此卑躬屈膝，那么，遇见了被他称之为“污滥”的官吏呢？也一样。他在战场上放走童贯，捉住了梁山的死敌高俅，更是“纳头便拜，口称死

罪”，说什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这就是他对所谓“污滥”官吏的态度。这一点说明，他不仅不反皇帝，实质连贪官也不想反的。皇帝和“贪官”，是属于同一个阶级营垒的。他们有时有矛盾，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宋江只反“贪官”与皇帝不一致的部分，而绝对不会从根本上反，彻底反。他在浔阳楼头吟反诗时曾宣言：“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初一听，好象要杀一大批“贪官”了。结果相反，他替皇帝去打方腊的起义军，血染了新安江，钱塘江，扬子江！因此，宋江的“反诗”，并不是反皇帝、反朝廷的宣言，甚至也不是反“贪官”的宣言，而是他残酷镇压农民革命的先声。

王 强(上海第一钢铁厂)：

我同意这个观点。宋江一度骂过高俅，但真抓住高俅后又向他求饶，这说明他们两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宋江只不过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高俅！不错，梁山义军的许多将领是受了高俅的迫害才上山的，但宋江后来不也去杀害其他起义军吗？他还动不动搞什么“斩首示众，破肚挖心”，高俅的残酷也不过如此吧！

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宋江最后还是被高俅毒死了，可见两人之间存在着根

本矛盾。我们说，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矛盾，有时也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远的不说，就说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军阀混战，也不是你要我的心肝，我要你的眼珠，动不动就是机关枪、大炮，闹得个不可开交吗？但他们互相之间的自相残杀闹得再凶，一遇到人民革命起来了，共同的阶级利益就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人民革命进行残酷镇压。高俅毒死宋江，这毫不奇怪。“狡兔死，走狗烹”。在反动营垒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杀掉个把两条对反动主子忠心的走狗是常事。

王炳英(上海第五钢铁厂)：

对！宋江和高俅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对那一派的矛盾。但还有一点要补充，就是在镇压农民起义这一点上来说，宋江要比高俅阴险毒辣，起的反动作用也更大。

这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对晁盖，高俅他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晁盖领着起义军多次消灭“进剿”梁山的官军，闹江州劫法场、三山聚义打青州，直到打曾头市，我们看到革命根据地在不断巩固、扩大，高俅等人只能干瞪着眼，半点办法也没有。但宋江一来就不同了。他大搞阴谋篡权活动，在不知不觉中把晁盖给架空了。不信，听我读两段：

宋江上山不久，晁盖号令兴兵攻打祝家庄，并且要“亲自领军马去洗荡那个村坊”。宋江马上钻出来说，“哥哥山寨之主岂可轻动，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

还有，柴进失陷高唐州，宋江又对晁盖说：“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便可轻动，小可与柴大官人旧来有恩，情愿下山。”

看，表面上口口声声称晁盖是“山寨之主”，实质上是拚命抓实权，抢兵权，让晁盖坐守寨栅，成了个“光杆司令”。对宋江这种手法，晁盖后来可能也看出来，因此在打曾头市时对宋江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看到这地步，晁盖想去一次，在舆论上也只是“替”宋江走一遭了。但刚“替”那么一次，就遭到暗算，中箭而死。试想，晁盖就是不死，实际上他已没有指挥调动的权力，还不是等于死了？宋江做了高俅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是宋江与高俅同类而又比高俅还要阴险的地方。

楼乘震(上海染料化工二厂)：

这么看来，我们对宋江的诨号“及时雨”要有一个新的解释了：他是在反动的封建政权千疮百孔、朝不保夕的时候，“及时”地混入了革命队伍，“及时”地捞取了政治资本，“及时”地排斥了晁盖，“及时”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及时”地为反动阶级尽忠效劳！他对反动统治者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及时雨”！

陆荷花(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维尼纶厂)：

我补充刚才小王讲的一点。撵弃和扼杀晁盖，是高俅们的愿望，是宋江的作为，同时，也是作者的意图。《水浒》第一回安排“一百单八个魔君出世”，已预告晁盖不在其内。到第七十一回，说到天上“落下石碣天书，载记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这无异是说撵斥晁盖是“天命”。难怪宋江当时要得意洋洋地说了，这是“上苍分定位数”，“各休争执”，“逆了天言”！

最近我们翻过一些材料，都是讲到梁山泊农民起义的，如《宣和遗事》、龔开的

《宋江三十六人赞》、《诚斋乐府·豹子和尚自还俗》、《七修类稿》，其间都说梁山泊三十六人中有“铁天王晁盖”，或“铁大王晁盖”，唯独《水浒》，不仅三十六名天罡中没有晁盖，就连一百零八人中也沒他一个席位。《水浒》作者和宋江一样，摒弃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归根到底，是为了宣扬投降，搞投降路线。

李素兰(上海儿童食品厂)：

刚才大家讲到宋江和晁盖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摒弃晁盖，实质上是为了排除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障碍。路线斗争总是社会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里的反映，因此，是不是可以说，晁盖和宋江的斗争，实质上是晁盖和高俅们的斗争在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反映。这种内部的路线斗争往往要比公开的阶级斗争复杂。梁山泊的许多革命者能认识高俅而不能认识宋江，就是因为他用一个“义”字把大家的眼睛蒙住了。

宋江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改来改去，一个“义”字没有改掉，其实，“义”字由“忠”字挂了头，它就不是“聚义”中的“义”字了，意思变了。宋江这里是在偷梁换柱。

“聚义”，是我国历史上农民发动起义的一种形式，被压迫农民以此为旗号把自己的队伍组织起来，向封建统治阶级宣战。《水浒》里，三龙山的鲁智深，清风山的燕顺，桃花山的李忠，直至最后集涓涓细流为大江，由小股起义而成为大规模的梁山泊起义军，都是一种有着大致相同的目标的聚合。但一到宋江嘴里的“忠义”，“义”就直接为“忠”服务了。这种“义”，就是用所谓“兄弟情分”来欺骗农民革命军，称兄道

弟地带着一支队伍去投降。有投降主义之“忠”，必然有投降主义之“义”。

韩菁芬(上海无线电七厂)：

宋江的“义”，既反动，又虚伪。他要起义军战士对他有“兄弟情分”，而自己却冷酷无情，虚伪而又自私。李逵总算对宋江“讲义气”了吧？但当他向宋江吟唱招安滥调表示不满时，宋江就下了这样一个命令：“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去斩讫报来。”虽然众将劝阻了，但李逵还是被关进了黑牢。投降后，宋江部下愤而杀了一个“贪官”，宋江也逼这个部下致死。大家可以想一想，宋江当年被判斩的时候，许多起义农民拚了性命劫法场营救他，但他却从来不知感恩，反过头来却要杀害他们，葬送他们，带着他们入虎口，使他们的革命运动归于覆没。这其实也不奇怪，“忠”也好，“义”也好，都有阶级性，忠于朝廷的人，怎么还会对起义农民“讲义气”呢？

王树理(上棉十七厂)

余锡君(吴淞化工厂)：

但可惜的是，当时不少起义农民没有，也不可能看穿这一点。《水浒》里不是几次写到过蒙汗药吗？我看，宋江这个“义”，是一种最毒、最危险的蒙汗药。

象李逵这样一个耿直豪爽、嫉恶如仇的坚强战士，未死于劫法场、闹东京的激烈战斗中，未死于反动官军的追捕“围剿”中，却死于一贯以“义士”自称的“大哥”宋江劝饮的毒酒中！这是很能够使我们看清投降派和投降派所鼓吹的理论对革命所造成的危害程度的。

恩格斯说过，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宋江所说的忠义，是地

主阶级的道德，而一旦塞进农民起义军内部，又必然是投降派的道德，扼杀农民起义的道德。

谈志超(上海锅炉厂)：

刚才大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我都同意。但还应看到，只要有投降，就必然有反投降，这是一条规律。这一点，连主张招安、投降的《水浒》作者也是无法掩盖的。比如书中写到宋徽宗派陈太尉到梁山泊招安，由于受到李逵等人的激烈反对而失败以后，宋江亲自护送陈太尉下山，并偷偷地说：“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这所谓“梁山泊的弯曲”，无非是指梁山泊存在着反投降派，搞起投降活动来不可能一帆风顺。

你看，这个“弯曲”有多大，李逵撕碎诏书，对太尉狠打臭骂，鲁智深、武松等人也“一起发作”。

到最后宋江投降路线得逞，“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百人。”这三五百人既然不愿招安，就必然有人把革命进行下去。而他们一走，梁山泊的“弯曲”总该消失了吧？也没有。李逵被宋江害死前，不还发出“反了罢”的悲壮呼号吗！这恰恰说明，梁山泊的革命被出卖了，但李逵等人坚持的反投降路线决不会消失。“石在，火种是不会灭

的！”正是这种绵延不断的革命火种，发展成熊熊大火的燎原之势，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吴安泰(上海运输公司一场)：

这场主张投降和反对投降的斗争，后来就反映到《水浒》的评论上来了。不少人歌颂投降派宋江，歌颂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正如毛主席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指出的：“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同样，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反对宋江和《水浒》的，反对《水浒》鼓吹的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的，鲁迅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真是一针见血。

顾秀林(上海眼镜三厂)：

鲁迅之所以在一片歌颂投降主义的喧嚣声中能有独到的见解，就因为他有着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应该向鲁迅学习，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努力提高识别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革命派和投降派的能力，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编者附记：本刊一九七五年第八期曾发表了《漫谈看一点文学史》一文，对《水浒》这部书，虽然指出了“小说的思想倾向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至颂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但却仍然认为《水浒》“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有助于我们认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长处、弱点及其失败的历史教训”。最近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和鲁迅论《水浒》以后，认识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文章的作者在提高了认识以后，对自己原来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并积极投入了战斗。本刊希望广大读者踊跃来稿，在斗争中共同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 《水浒》研究中 各种不同意见的综述

## (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评论

### 一、对《水浒》的总的评价

第一种意见,认为《水浒》是学习的典范,反映了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部英雄的史诗,不能划入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如有人鼓吹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水浒》等作品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给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一大历史功劳。这些作品应作为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学习的典范。有的人则宣扬说,《水浒》一书的根本精神是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它以宋江等英雄人物为主干,全面地描写了中国中世纪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深刻地、大胆地描写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描写了农民的革命斗争、革命力量和革命思想,反映了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希望,同时也反映了农民革命思想的不彻底性和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缺点。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被划到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去的。还有的人认为,《水浒》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农民战争的史诗,是出现在中国近古文学史上第一部,而且是后无继者的描写农民革命的最完整的革命文学杰作。又有一些人认为,《水浒》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主义精神。梁山好汉在忠义堂前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所“行”的就是“兀自要和天皇帝做个对头”的“道”。又还有一些人认为,《水浒》的思想,就全体上说,是以农民思想作为领导思想,而且这种农民思想是革命阶段的农民思想。《水浒》既然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曾经存在的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那末,它成书以后也就必然会以它的革命的思想内容来直接推动了社会上依然存在的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它对后世的人民群众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行动产生了无法估计的深远的影响。在封建社会的黑夜里,《水浒》不仅给后代的农民革命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力量,从思想上给后代的农民起义军以有力的武装;同时,也为以后农民革命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斗争方法。

第二种意见,认为《水浒》的作者冲击了封建传统观念,坚持描写农民起义的正义斗

争，对受招安持否定态度。如有的人宣扬，《水浒》的作者，虽然使宋江说些“非敢反叛朝廷”之类的话以作掩护，然而却以完全同情的、肯定的、拥护的态度来描写这些“大逆不道”的人。《水浒》这部书，是天才作家根据人民群众在长期间形成的传说故事加以组织和加工而写成的。他是站在人民和正义的一面的。有的人认为，作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冲破了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用他的全部热情，全部艺术创造力，歌颂和描绘了这一农民起义运动，反映了农民起义运动的真实的历史面貌。决不能只从宋江征方腊一个问题上，甚至只从“忠义水浒传”这个书名上，就把“这部小说的编著者”诬蔑为“强奸了这帮绿林豪侠的意志”。也有的人认为，《水浒传》作者当然没有阶级观点，但由于他具有同情农民起义的坚定立场和爱憎分明的正义感和进步的思想觉悟，在展开出来的波澜壮阔如同史诗一般的画卷里，确实反射出来阶级斗争的思想感情的强烈光辉。还有人认为，施耐庵的功绩是基本上站在人民的立场，和人民同欢乐、共悲苦，热情讴歌农民的起义斗争。这是《水浒传》异于其他文人创作的根本特征，也是《水浒传》取得伟大成就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又有人认为，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经过上百年的酝酿，在作家施耐庵的巨大帮助之下，终于在文学史中争得最光荣的地位。这样庄严伟大的史诗式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第三种意见，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是做对了，增强了《水浒》的人民性，革命性。如有人认为，金圣叹毫无顾惜地给它一个腰斩，干脆不承认宋江曾被“招安”，而有“征方腊”、“征田虎”、“征王庆”等事，我们不能不说他是做对了。虽然在他的批本中具有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在字里行间污蔑了英雄宋江，又伪造了一个“噩梦”，希望梁山泊英雄同归于尽；但正因他是如此处理，反而使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不致背叛他自己的阶级，而向统治阶级投降妥协，就格外增加了《水浒传》的人民性，革命性。虽然全本《水浒传》是被金圣叹“腰斩”了，但他偏偏截至“梁山泊英雄大聚义”为止，使读者想望革命力量的不可战胜；这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 二、对宋江的评论

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农民起义的英雄，集中了当时农民革命领袖的品质和面貌，宋江的道路是一个兼忠臣孝子、逆子贰臣于一身的革命者的道路。如有的人宣扬：在《水浒》中宋江主要是作为农民起义的英雄而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并不因为受招安问题而改变。宋江，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去看，是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一个辉煌的艺术形象；在这形象里，反映着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他的革命性不仅和他的被压迫相联系，而且作为农民起义的一个领袖，还和他的潜伏在心里的“称帝称王”的野心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果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他的革命性也往往不能达到那时代所可允许的高度。有人则说，宋江为什么能坐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我们不能忽略了他的义行之外，还是梁山泊的组织者，固然没有宋公明也会有人起来造反，但因为他而梁山上的人才愈加兴盛，是一个事实，并且多是由于他的义气，所感召而来的。同时，攻守战阵，调度有



方，山泊大寨，各有司守，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在他的治功之下，无怪乎后世目之为理想的社会制度，亦并非过份吧。至于“替天行道”，在愚昧者固不妨从字面上理解，而《书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早有注脚于前，又何必机械的去看呢？有的人则认为，宋江的道路是一个最初出身于封建家庭、曾服务于封建阶级却又参加了农民起义、而最后又被封建阶级杀害的叛逆者的道路，是一个兼忠臣孝子、逆子贰臣于一身的革命者的道路。也有的人认为，宋江的流落和发配，实际上就是聚集起义英雄的号角。宋江的上梁山，更使得农民起义军从霸据一方转为向封建统治者、封建地主阶级直接进攻的标志。宋江的性格发展史和梁山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有着密切的联系。《水浒》作者正是通过宋江的性格发展来显示起义军紧密团结意志的。还有的人认为，正由于宋江在统治阶级中是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并和下层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义士”“英雄”，所以走上梁山之后，就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意见（由口号到组织、策略），而使得革命有了空前的发展。而作者在写梁山革命军发展斗争的过程同时，也表现了宋江能团结群众，讲义气，在具体斗争中（如三打祝家庄、打曾头市、打大名府等）立场稳定、遵守革命纪律等优秀品质。作者不但写出了“一个真正胸怀大志，企图效法黄巢创造一番伟大事业的革命者”的形象，而且写出了“他所以成为众望所归的广大革命群众所拥戴的革命领袖的令人信服的原由”。又有一些人认为，宋江不仅认为攻城夺府、杀尽滥官酷吏、发展梁山义军势力，是对梁山泊革命事业的忠诚；而且认为争取朝廷招安的投降路线，也是对梁山泊革命事业的忠诚。宋江思想中这种“忠”的观念的双重性，使他不自觉地误害了自己的阶级弟兄，但他却还以为把弟兄们引上了正路。也有人认为，作为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宋江的形象是写得成功的。他既是促使农民起义事业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导致农民起义事业变质、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两个看来矛盾的东西，在他的性格的两面性上统一了起来。宋江的性格始终是双重的，反抗性和妥协性纠缠在一起，反抗和妥协的两面互有消长，有时妥协的一面反而会占据上风。又还有人认为，宋江之成为梁山领袖并不是偶然的。他在起义首领中拥有最高的威望，而反对贪官污吏对人民的迫害，也正代表着大多数梁山好汉的基本思想倾向。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由于他的谦逊友爱、关心弟兄，所以能把梁山英雄都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宋江以自己的雄才大略为起义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他精明练达，善于运用正确的策略，利用敌人矛盾，以打击敌人，扩大革命事业，使之蓬勃发展。梁山泊具有那样的组织规模，以及在对敌斗争中所取得的那样的辉煌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分不开的。就这些方面来说，宋江是代表梁山起义军基本利益的德高望重的领袖。更还有人认为，梁山泊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领导之下而兴旺起来是和宋江分不开的。他是经过群众斗争的考验的领袖。

第三种意见，认为宋江投降是现实条件造成的，是农民革命本质的反映，表现了宋江的进步性，不能把妥协投降归罪于宋江的领导路线。如有的人宣扬，从历史上看，固然有投机分子和本来就是动摇的分子等等的种种受招安者，但也有坚决的革命者因错误和现实的局势而造成这种现象以结束他们的命运的。宋江的革命性格，象在前半部所描写，既是现实的局势和农民革命力量所决定，则把他的失败或“悲剧的”结局看作主要是由现实

条件的推移所决定，比起说这是他本来“动摇”的结果，是更能够深刻地说明历史的现实的。有的人认为，在分析水浒义军受招安、走向妥协道路的时候，不能把这种历史局限性简单地只归之于宋江的“领导路线”。必须充分估计宋江在水浒义军中的积极作用。即使是宋江的所谓“妥协投降的路线”，也同样是反映了农民义军的软弱性的一面，这从他们的反抗思想和反抗旗帜上都是可以看出来。也有人认为，宋江的弱点，就是农民阶级根本的弱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一般农民运动所不可避免的弱点。不能只单纯地看到宋江的家庭出身和封建教育给他的影响，而没有看到受招安的思想是农民革命本身不彻底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思想水平要求宋江，怨他不该妥协，骂他是投降主义者，出卖了农民革命。因为农民革命本身就是不彻底的，这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有人认为，受招安不是宋江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立场的问题，而是农民革命的本质的反映，是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的本质的反映，受招安不能归罪于宋江一人。在招安前，虽然内部有两种意见的分歧，但并没有形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的受招安是农民革命妥协性的本质的概括；是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在梁山泊这个特定的起义中的具体反映。还有人认为，《水浒传》非常正确地通过宋江这一悲剧人物的塑造，来反映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他不满贪官污吏，同情起义人民，又对最高统治者存有幻想。因此，他不想根本和那个制度决裂，而是“素怀归顺之心”。这个投降不是消极的，其目的仍在于“替天行道，保国安民”。宋江不是个人野心家，他是从集体的利益去研究问题的；他渴望弟兄们找到一条出路。李逵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虽则痛快，但将问题简单化了，梁山还缺乏这个力量。于是另一条出路便是招安。在宋江等看来，这便意味着与最高统治者合作，同贪官污吏继续进行斗争。宋江要做好事，却做了坏事，全心全意为起义军服务，却破坏和毁坏了起义军，这就是宋江的悲剧。宋江的受招安的路线是错误的，但并不足以损害宋江这个领导者的英雄形象。

### 三、关于“招安”问题

第一种意见，认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农民固有的思想，农民的被剥削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他们安于适当的剥削，承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合理性，受招安不是出卖革命。如有的人说，农民群众对于皇帝和统治阶级经常会存种种的幻想，总希望有好皇帝和好官们来使政治好起来，往往只把黑暗的统治归因于“奸臣”和“滥官污吏”，这是农民起义群众和领袖都容易发生受招安之类现象的一个带历史性的思想原因。如果在当时社会封建生产关系还是巩固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还是合理地具有支配的势力，则根据封建主义思想去维护封建制度，不仅在统治阶级看来是合理的，在所有的人看来也还是合理的。农民对于适当程度的剥削，则大都无异议，因为适当的剥削，农民还能够负担，封建社会还能巩固，当时人们也只能如此要求。农民作为一个被剥削阶级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有的人认为，拥护皇帝，反对贪官污吏，这正是普通农民的思想，它是和小生产者所处的环境的分散性和闭塞性，以及保守观念有密切关联。杀害封建官吏和“忠心报

答赵管家”，这本来是互相矛盾的思想，但在农民看来，却是统一的。而且这种矛盾而统一的思想，一直贯串在他们的斗争行动里。这和宋江的悲剧思想矛盾——一方面和封建王朝作斗争，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皇帝的招安——是相一致的。也有人说，宋江的农民革命思想是典型的，不打倒皇帝，也不想自己当皇帝，代表了梁山上大多数好汉的思想，也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农民的思想。还有一些人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下，不仅是社会上的一般文人有忠君思想，就是广大农民受到了封建正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也或多或少有忠君思想。我们如果从“反抗官僚地主，拥护好皇帝”的论点来看问题的话，宋江终于走上招安的道路，是可以理解的。农民的生产地位，使他们不可能提出和实现一种比封建社会更先进的制度。《水浒传》的忠君思想正是这个历史局限的反映。

第二种意见，认为受招安是农民的局限性，是农民革命战争的必然结局。主动受招安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强大力量。如有的人说，受招安现象一般地反映了农民起义的缺点和弱点，但决不能把一切的受招安都看作出卖革命。受招安这类问题是和农民革命思想的不彻底性及斗争中种种缺点相联系的。当农民起义在统治阶级的镇压和欺骗之下而发生动摇或濒于失败时，受招安之类的思想甚至于可以成为群众性的潮流，这固然包含着破坏分子从中破坏的作用，但更多地包含着群众的失败情绪。有一些人认为，“受招安”和“征方腊”，这正是水浒英雄最后必然走向的结局中的一种。作为农民起义军革命战争的规律，它的历史的必然结局，——如不是被镇压屠杀，就是妥协、投降和变质。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不能不形成《水浒》的悲剧结局的结构。水浒英雄的悲剧结局，正说明《水浒》作者忠于现实的特色，并不能丝毫减低它的价值。宋江的这种妥协性格，并不仅是他个人的妥协性，而是代表了农民起义军中的整个趋向。也有一些人说，《水浒》一书可说是极全面地反映了有关农民起义走向失败的具体道路，也即是说，《水浒》是以文学形式，反映了农民革命失败的必然性。只有加上了“受招安”和“征方腊”两部分，才使《水浒》成为现实主义地表现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具有完整性的作品。还有一些人认为，《水浒》所以选择“受招安”和“征方腊”的结局，是被《水浒》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代的必然规律和《水浒》故事本身的要求所决定的。在《水浒》所反映的时代的历史条件下，象梁山这样的农民起义，只可能有这样一个结局。又有一些人说，宋江领导的农民革命避免不了失败的历史命运，只不过这种受“招安”的失败结局是另一种特殊的形式而已。也还有一些人则断言，要宋江不妥协，革命到底，不受“招安”，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妥协性是农民革命的又一特色，这一特色是与农民革命不自觉的特色紧密相联的。又还有人认为，由于农民是个体生产的小私有者，又长期受了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们眼光看得不远，对统治者存在着幻想。农民起义的前途只有两条路，或是被消灭，或是受招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历史的事实。

第三种意见，认为受招安是反映了人民抵御外侮的愿望，包含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如有的人认为，在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受招安也是人民的愿望。因此，写宋江受招安，有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有人说，宋江的接受朝廷“招安”，与其说是“忠君”思想的表现，不如说是民族意识的流露。还有人认为，作者其所以让梁山泊英雄好汉选择“招安”这条道

路作为自己的归宿，不但由于它是历史事实，同时还因为当时人民由于仇恨异族侵略者，他们多么希望象梁山好汉这样的英雄来为国御敌。

第四种意见，认为《水浒》写受招安，不是宣传投降，而是对投降的批判。如有的人认为，作者虽然写了宋江的投降，但不是在宣传投降，而是告诉人们说，“投降是一条死路！”因为写出了受招安以后的悲惨下场，给读者的印象和效果是，“造反有理，招安倒霉”，这就告诉了人们，要活下去，就得反抗，受招安是不成的。统治阶级之所以认为这部小说是“海盜”的，屡次加以禁止，正因为看出了它巨大的作用。也有人说，《水浒》对招安问题的批判，不是用的理论，而是用的事实。也即是说，《水浒》是用具体事实否定了宋江的主动争取招安。

#### 四、在当时也有一些评论，在肯定《水浒》的前提下，对宋江和“招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江上了梁山，走向和农民起义军结伙的公开反抗的道路，这是他的进步。他为壮大梁山义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中国二、三千年的农民革命史上，可歌可泣、前仆后继、英勇壮烈的英雄人物何止千千万万，投降叛变的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败类。怎能闭着眼睛说宋江投降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呢？这不是诬蔑农民阶级吗？也有人认为，尽管招安也许可能作为农民革命的一个前途来反映，但至少这个结果是意味着农民革命者向封建统治者的“投降”，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结果，最普遍的总不是“受招安”，而往往是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农民革命的弱点而残酷地镇压下去。假如《水浒》作者这样来写，也许可能更深刻和真实地在反映农民革命的伟大的同时也反映出农民革命必然失败的本质。还有人认为，我们决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却不能放松对历史事件所表现的投降主义倾向作斗争和清算。就拿和宋江同时代的方腊来说，几乎是战至一兵一卒，然后被俘身死，不愧为杰出的农民领袖，纵然失败，我们仍然寄予他们最大的敬意和同情。而对宋江的接受皇帝“招安”，“归顺”朝廷，因而使梁山泊起义彻底失败，我们必须加以深刻的批判。

第二种意见，认为要“征辽”必先“受招安”，这是从封建统治者的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出发，宣传投降主义。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必然失败，这是农民起义的历史悲剧，也是反动统治阶级最毒辣、最卑劣的罪行。但是“必然失败”并不等于必然“受招安”。从形式逻辑看，有些人是以“受招安”的概念偷换了“失败”的概念，更主要的是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老爷的立场。从《水浒》看，作者的世界观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虽然他同情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把“民反”看作“官逼”的结果，但他一直把梁山泊，特别是梁山泊领袖宋江看成并写成忠于最高统治者的人。

##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评论

### 一、对《水浒》及其作者的评论

第一种意见,认为《水浒》是一部歪曲农民起义的作品,鼓吹投降主义路线,要分析批判。如有些人认为,《水浒传》歪曲了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情况,按照地主阶级的如意算盘,塑造了一个作为全书主脑的、艺术形象的宋江,鼓吹了一条占压倒优势的投降主义路线,就小说作者所歌颂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水浒传》是歪曲农民起义的一部小说。作者赞成宋江式的“起义”,反对方腊“篡改年号”“图王霸业”那样根本否定宋王朝的农民起义,可见作者希望的是“明君——忠臣——清官”统治的天下,这不过是中小地主对改良封建政治的幻想而已。还指出《水浒传》大肆鼓吹的“义气”思想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策略依据。还有人认为,作者的世界观有着十分明显的孔孟之道的烙印,正是儒家的“忠义”观念使他对宋江作了这样的描写。《水浒传》这部书也不是一部好书,我们不仅要分析批判宋江,还要分析批判《水浒传》这部小说。

另一种意见,认为《水浒》及其作者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起义,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的。如有些人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水浒》不只是描写了农民起义,而且写出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是“乱自上作”;不仅是带着深厚的同情,而且以热情的态度来歌颂了那些天不怕,地不怕,官府不怕,甚至连皇帝也不怕的英雄人物。在《水浒》以前,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表现出这样鲜明的革命性和深厚的民主性。作者对宋江的受“招安”虽然寄予同情,但并不是完全赞同,也可以说是对宋江受“招安”的一种批判。同时,从社会效果来看,《水浒》对明、清的农民起义是起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的。还有人认为,象《水浒》这样以高昂的音调,雄伟的气魄,饱满的热情,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它一定要同农民起义一样永垂不朽,是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水浒》不是以宣扬封建思想为主的儒家作品,而是一部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小说,全部肯定和全部否定它都是错误的。如有人认为,《水浒传》刻画的一百零八将,只有一个农民,那就是第四十一回交代的庄家田户出身,能使一把铁锨的陶宗旺,其余的一百零七人,有贩水银、贩羊马的小商人,手工业工人和说唱艺人,衙门官吏,落魄文生,医生,道士,“亦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的渔人,“闲汉”,犯罪的下级军官,朝廷将领,沦落的“帝子神孙”等等。……李逵因打死人,流落江州,做了“牢里一个小卒子”,已经非农民化了。可以这样说,《水浒传》中的起义军没有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水浒传》不是以宣扬封建思想为主的儒家作品,它在冲击封建意识形态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它也不是以描写农民起义为主,体现了农民阶级革命思想的作品,而是一部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小说。



## 二、对宋江的评论 (二)

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江不失为农民起义领袖,他题反诗是他思想转变的新起点,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如有人认为,宋江所生活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上层官府的世界,一个是下层江湖人物的世界。在前期,宋江思想中是以讲江湖义气的思想居主导地位的。而宋江上山后,由于客观形势对起义军的发展极为有利,加以他有一定的威信、经验和才能,山寨的局面的确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兴旺起来。因此,宋江的思想性格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在他身上既有革命、反抗的一面,这一面后来有所加强;又有软弱、妥协、动摇的一面,这一面早期特别严重。但是,浔阳楼题反诗是宋江思想性格转变的新起点,虽然不是根本的改变。农民起义的大潮把宋江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小官吏裹挟进去了。从此,宋江开始了革命生涯。加之宋江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受到梁山英雄的拥戴。他亲自指挥的三打祝家庄,夜攻曾头市,智取大名府等战斗,杀得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军和反革命的地主武装丢盔弃甲,失魂落魄,沉重地打击了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总之,宋江虽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形象。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卖者,推行的是投降路线。如有人认为,宋江虽然和大地主、大官僚存在着矛盾,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非对抗性的。他们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都剥削压迫农民阶级,也都仇视、镇压农民起义。宋江在江州法场被救出后加入农民起义队伍,并不意味着他已彻底背叛了原属的封建地主阶级,也不意味着他已与头脑里的孔孟之道彻底决裂,所谓“从此,宋江开始了革命生涯”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宋江在浔阳楼酒醉题“反诗”的实质,是笑黄巢不是“大丈夫”,错过了接受朝廷招安、“建功留名”的良机。笑的正是黄巢坚持斗争的革命性。他要“血染浔阳江口”,也无非是打算借农民起义的力量取得一点实力地位,作为实现“凌云志”的资本罢了。宋江正是由于他把参加农民起义当作到达他尽忠尽孝功名成就的理想境界的特殊道路,使他在梁山泊执行了一条妥协投降的路线。他充其量只是农民起义的同路人。在《水浒传》里,不是农民起义改造了宋江,而是宋江改造了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扭转了农民起义的大方向。还有人认为,在晁盖去世以后,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便立即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宋江这一“正名”,象征了他的以“忠”为核心的妥协投降路线已经逐渐占了上风。特别是当以宋江为代表的错误路线逐渐处于支配地位的时候,情况就更形恶化。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大聚会,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但在实际上,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已经窃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反动力量达到了恶性膨胀的地步。不仅如此,宋江还硬将北京富商和大地主卢俊义拖进忠义堂,让他当了第二把手。这是一条为妥协投降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又有人认为,纵观中国农民革命史,以争取招安为目标的农民起义,是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的。封建社会的农民有这种或那种局限,但是却并没有妥协投降这一种局限。革命性是农民阶级最主要的本质。因此,决不是农民的阶级地位限制了宋江,而是宋江对农民阶级的反动。

# 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

## 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学习《〈共产党人〉发刊词》的一点体会

方 海

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革命斗争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革命斗争的发展，要求我们把党的建设成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列主义政党，有力地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完成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经过十八年的斗争，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塞维克化的党。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党所处的环境和担负的任务较之过去有很大的变化。为此，要求党必须不断进行自身建设，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面临着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各级党组织也只有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才能担负起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

毛主席明确指出，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就必须按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最深刻的表现，而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则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最近毛主席关于理

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就深刻分析了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指出了由于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一部分党员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主席还告诫全党，由于我国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險。反修防修，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倾向，这是我们现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广大党员不断开展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批判，坚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自身，加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此，就必须对党员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教育，强调立党为公，不谋私利。我们坚决反对象林彪那种为了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搞宗派、树山头的倾向，决不容许在党内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乱传小道消息，刮阴风，点鬼火，搞分裂党的活动。林彪一伙丑类尽管极善于玩弄分裂党、分裂中央的阴谋诡计，但最后只是徒然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早在一九四二年整风时，毛主席就已严厉批判了党内的宗派主义，批判了各种违反无产阶级党性的不正的党风。毛主席说：“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要加强党的建设，就必须肃清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用党的优良作风战胜党内不正之风，才能使我们的党队伍整齐，步调一致，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要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就必须教育广大党员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增强识别是非的能力，提高思想觉悟和路线觉悟的水平。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真理和谬误就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没有反面的东西作比较，对正



面的东西就不能加深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党就是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彭德怀、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没有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也就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党的发展和巩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客观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因此，我们决不能害怕矛盾、回避矛盾，而是应当承认矛盾，学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斗争的本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掌握党的政策，批判和战胜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如果我们不讲对立面的斗争，害怕人们跟唯心主义见面，跟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错误思潮见面，就必然搞不好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反而会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共产党人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决不怕挫折，决不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怕向我们提批评建议。即使是毒草吧，无非一是锄掉，二是锄掉了当肥料，而结果只能是帮助我们开了眼界，锻炼和提高了鉴别是非的能力。

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为此，我们在重视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的前提下，还必须认真抓好党的组织建设。但是，组织路线从属于思想政治路线，党的建设必须以思想政治建设来统帅组织建设。比如，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就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组织建设的问题，更不是形式上考虑各方面人员的搭配问题，而首先是如何端正思想政治路线的问题。为此，就必须强调认真读书，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高思想觉悟、路线觉悟和政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领导班子成为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进一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好我们的党。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中，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搞清楚党的建设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的各级党组织都成为领导广大群众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坚强堡垒，使广大党员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一代一代地奋斗下去。

# 要教育党员带头继续革命

中共上海吴泾热电厂委员会

教育党员带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中的体会，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广大党员牢牢确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而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

从我们厂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从入党时候开始，就下定了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特别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这一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们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跑在前，阶级斗争冲在前，艰苦工作干在前，改造思想走在前，朝气蓬勃地带领广大职工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但是，也有一部分党员同志由于学习不够认真，觉悟不高，一谈起共产主义，往往会觉得“这是理论上的事，离我们远着呐”！一遇到困难工作，又会认为“重担大家挑，少我一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出现了“只要过得去，凑合着干也没啥”的情绪。这种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忘记了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忘记了党的基本纲领和最终目的。

针对上面存在的这种思想，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中着重对党员进行了党的性质、任务、共产主义理想和前途的教育。大家通过学习，认识到了即使是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也有一个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从而提高反修防修自觉性的问题。如果放松了看书学习，就会分不清是非，辨不清方向，也就谈不上继续革命。经过这样的教育，大家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宏伟目标，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而是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因此，我们必须放开眼界，展望未来，今天干社会主义，要想到明天的共产主义，不是在口头上而是要在实际上牢固树立起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一辈子的思想。

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必须引导党员跳出小生产思想的圈子，摆脱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的束缚。比如，有的同志存在“按酬付劳”的思想，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

多干一点活或少取一点报酬，一事当前，先要掂量一下对自己合算不合算；有的同志党的观念淡薄，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只要个人自由，不要纪律约束；还有的同志只满足于“实实惠惠做生活，太太平平过日子”。这些小生产者思想的影响，对党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妨碍极大。只有不断地铲除它的影响，才能振奋革命精神。为此，我们组织了党员认真学习革命导师关于共产党员要解放全人类的教导，批判刘少奇、林彪鼓吹的“利己多欲乃规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反动处世哲学，同时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这些同志自觉地提高觉悟，跳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看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事实证明，共产党员只有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让思想冲破牢笼，真正解决思想上完全入党的问题，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入，是影响党员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厂有个别的党员，入党前虎劲十足，生气勃勃。入党后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面前逐步失去了抵抗力，甚至发展到把自己当成了商品。象这样把共产党员的称号当成可以换取个人名利的阶梯的人，虽然是极少数，但却为我们敲起了警钟。我们引导大家从回顾总结社会上和厂内少数党员犯错误的历史教训，使大家看到，从生活上打开缺口，利用糖衣炮弹向无产阶级进攻，是地主资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并在我们队伍内部培植和分化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我们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丧失警惕，就会在糖弹面前打败仗。为了帮助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端正入党动机，并对广大党员进行教育，我们组织党员通过总结正面典型、解剖反面典型的方法，开展了“入党究竟为什么？”的讨论，使大家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同志们还主动寻找在新形势下资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许多特点和规律，例如，工作有成绩时，资产阶级就会用阿谀奉承、捧场吹嘘来迎合你，手中有权时，资产阶级就会用花言巧语、请客送礼来拉拢你，职务提升时，资产阶级就会用吃喝玩乐、金钱美女来腐蚀你，等等。这样，就使广大党员进一步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认识到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

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是一次极其深入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每一个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思想，下定决心，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怎样把理论学习引向深入

编者按：本刊编辑部邀请部分单位，就下一步的学习打算进行了座谈。现将座谈纪要发表，供大家参考。

刘作恩(上钢五厂党委副书记)：

最近，我们厂里办了一期中层以上干部学习班，回顾总结前一时期的学习情况，研究下一步怎么深入下去。初步打算如下：

一、围绕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点政治经济学。我们想着重研究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怎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特别是如何不断改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这个专题现在有五、六个车间在讨论，我们打算结合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加强企业管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二、学习毛主席有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论述，批判林彪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最近，二车间和供应科组织理论队伍和部分班组对林彪一伙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进行批判，学批结合，把两种不同的观点鲜明地对照起来，大家印象很深。这种一事一议，一事一批的方式，能比较广泛地发动群众。供应科的工人同志文化水平不高，但人人都投入批判，八十多个学习小组在短短几天中写了一百五十多篇小文章。青年工人还成立了很多突击队，天大

热，人大干，个个干劲冲天。

三、结合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理论学习中有不少有争论的问题，例如，如何正确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优越的，但有些方面又同旧社会差不多？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又讲我们的基础不稳固？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相互关系既是同志关系，又说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还有没有两重性？等等。对于这些，应当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来全面地、辩证地加以认识。大家觉得，学习要深下去，学一点哲学是很必要的。

总的来说，我们觉得今年内的工作仍然应该把学习理论放在首位，紧密联系实际，推动各项工作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张云芳(沪东造船厂党委办公室负责人)：

我们厂现在学政治经济学的人很多，有的车间还在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学点政治经济学，目的是为了弄清楚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深入领会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因此，应该有

重点地结合专题来学。党委发动工人理论小组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初步确定围绕“商品、货币”,“按劳分配”,“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造船工业两条路线斗争”等专题来学。

这样学习了一段时期,效果基本上好的。有的老工人在开始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时说:“新旧社会两重天,为什么又说与旧社会差不多?”后来他们学习了《资本论》第一章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认识就有了较大的提高,说:“我们现在的商品中,也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如果不坚持政治挂帅,搞什么产值挂帅,也会损害国家统一计划。”大家还谈到,由于商品制度存在,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如果不加限制,有的人可以利用它来搞投机倒把,自由贸易,助长资本主义倾向。这样一学一对比,加深了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

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应当注意防止两个倾向。在知识分子、青年较多的班组中,欢喜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看看蛮热闹,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另外一种倾向是生搬硬套,找个例子,套一顶帽子,而不是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实际问题,这样收获也不大。这两种倾向都是学风问题。只要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这两种倾向也就不难克服了。

刘善群(上海电子管四厂党总支委员),

我们厂最近在党总支领导下,制订了一个全厂学理论的规划和一个理论队伍的五年规划。我们怎么会想到订规划的呢?主要是看到上半年的学习还比较乱,问题讨论了不少,真正弄懂的很少。因此,大家说一定要搞一个规划。我们根据上半年学习的实际,有重点地分别不同对象,把几个专题深入下去,将读书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大体上安排个进度,一步一步地学。理论队伍还有个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因此搞了个比较长期的规划。

有没有一个规划大不一样。制订了规划的一个月以来,我们比较集中地学习和讨论了领导权和所有制的问题,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对人们思想的腐蚀问题,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上的表现等。由于目标明确,大家读书、调查更有了方向,劲头也更足了。

严以宁(电子元件公司办公室负责人),

我们最近也总结了前一时期的学习情况,研究下一步如何深入,想搞一个大体的打算。下一步如何学?我们感到,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学习的要求也不应当划一,而是必须区别对待。

我们着重对公司所属二十八个单位中心组的学习情况分析了一下。今年以来,多数领导干部逐步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但是,有些同志在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时“求新不求深”,刻苦钻研不够,个别干



部忙于业务,连一本书都没有能好好读完。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有些同志仍在等待,一级看一级,“学习讲千遍,思想不沾边”,应当及时解决的问题老是捂着不去触及。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地多读一点书,特别是要认真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并围绕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提倡学一点政治经济学。我们打算搞一个学习班,每期五天到七天,在下半年内把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轮训一遍。从我们公司的情况看,大多数班组还是要深入学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我们打算把它分成几个单元,分得细一点,便于大家抓住中心,联系实际。理论队伍要求多读一点书,改变那种忙于应付、不深不透的状况,并要求认真搞一点调查研究。

史仁良(沪江机械厂党总支副书记),

我们厂和车间的理论队伍共有二百个人,约占全厂职工的四分之一。前一时期,大体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集中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和群众一起开展专题讨论,二是自己先学一步,然后向群众进行辅导、宣讲,三是同群众一起及时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

最近,我们厂党总支在总结前一时期学习情况的基础上,打算搞一个理论队伍的长远规划。当前,主要是配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学一点政治经济学,着

重围绕一些专题来搞好宣讲和辅导。这些专题是:如何认识和恰当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何进一步改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好斗、批、改;搞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继续批判产值挂帅;划清建立利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与管、卡、压的界限;澄清一些模糊思想,加强企业管理,等等。

金乃毅(豫园商场政宣组负责人),

我们单位没有在座的兄弟单位学得好,要把学习深入下去,看来进行一次认真的小结很有必要。前一时期,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逐字逐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及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以后又按专题进行学习,力求把问题搞得清楚一些。下一步的学习,我们打算总结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方面的历史经验,通过学习搞清楚哪些是应该坚持的,哪些又是必须加以抵制的,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商业工作搞得更好。

方天任(上港五区政宣组副组长),

在学习中,有的老问题看来是熟面孔,但不一定就搞得很清楚了。例如分工和协作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开始认为是“老骨头”,没有啥可啃的了。可是认真追问一下,协作和岗位责任制是什么关系,分工中间的资产阶级法权具体表现又是什么,为

什么弄得不好就要破坏社会主义的人们相互关系等等，就讲不大清楚了。最近我们围绕“如何正确认识旧分工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专题，一边读一些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一边调查码头分工的历史和现状，觉得对老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学习，看到分工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是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密切联系着的。码头上，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分工就有很多的变化，本来没有的工种，如司机、机修、工具管理等等，就出现了，因而协作的要求也更紧了。可是，分工又是同企业的性质相关联的。在旧码头，资本家为了残酷地压迫、奴役、剥削工人，建立了层层等级，光是库场人员就分栈正、栈副、学徒、工人等等，强化了资产阶级法权。解放后经过几次改革，码头上人们的相互关系有很大变化，但是旧的痕迹依然存在，如果企业管理路线不对头，旧的一套还会死灰复燃。

结合调查研究，边学、边议，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大家学得有劲，“老骨头”也嚼出新味道来了。因此，我们觉得，要使学习深入下去，关键还在于真正发扬毛主席一贯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姜国祥（群众印刷厂党总支委员），

要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下去，我看学习方式上也要搞得生动活泼一

些。今年上半年，厂里生产任务脱了一点，个别干部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在黑板上一写，“明天星期六大家来义务劳动。”因为没有同群众商量，搞了几次，有的工人有意见，在同一块黑板上写了《学习与批判》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有些同志遇到生产任务完不成，动不动就组织义务劳动加班突击，以此来掩盖企业管理工作上的缺点和问题。”这么一来，大家都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个工人有道理，有的说他不对，个别干部还说他是“拆墙脚”。到底应该怎么看？党组织就抓住这件事，让大家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讨论。讨论的专题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企业中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种讨论，既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相互关系的根本道理，又联系具体的事情来展开，大家反映收获比较大。过去有不少同志存在着“干部管，群众干”的想法，对于群众参加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经过讨论后，执行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教导的自觉性有所增强。对于加班这样一个问题，大家也有新的认识。不少同志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提倡用革命精神来搞好革命工作，有时搞一点突击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老是依靠加班加点来补差额，而以此掩盖管理不善的缺点。六月份，我们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比较活跃，生产任务完成得也比任何时候都要好。

## 定额制度也有 资产阶级法权吗？

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厂里在发动群众修订工时定额和原材料消耗定额时，引起了一场争论。原来提出要修订旧的定额的理由，是因为这些定额早就落后于实际成绩，已经远远不适应生产发展，并且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了。但是，有的同志说：“定额制度是用同一的尺度去衡量具有不同劳动能力的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因此，修订定额，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理论小组的多数同志觉得这种意见不对，但又不能从理论上说清问题，想请你们帮助分析。

王恭肖

王恭肖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下面我们请叶伯乐同志谈谈他的看法，供同志们讨论参考。

——编者

恭肖同志：

工厂企业为了保证全面完成国家的各项生产计划，往往对某个产品规定了在一个单位时间内必须达到的产量以及质量、原材料消耗等等标准。这种标准，就叫定额。它是工厂企业组织大生产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对于这种合理的规章制度，我们要积极支持，认真执行。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时定额、原材料消耗定额这样的规章制度，是资本家用以奴役工人，向工人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

的工具。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已经夺回了生产资料，否定了剥削制度，定额制度的性质和作用就起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列宁说过，“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规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国家与革命》）定额制度也是这样的一些法规规范。特别是工时定额，它是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用来检查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情况的标准之一。它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去衡量各个劳动者，而不管劳动者之间技术熟练程度、体力强弱



的差别。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它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

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有它的历史作用。但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广大劳动人民“各尽所能”地为社会劳动，是靠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他们总是把努力完成定额当作自己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常常超过定额规定的指标，并且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在我们的许多工厂、车间和班组里，广大工人群众千方百计、大搞技术革新，来达到和超过定额标准，同时大家相互帮助，使技术较差和体力较弱的同志也能赶上前进的行列。这种先进思想和行动，已开始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有效限制。你们厂里广大工人提出修订工时定额和原材料消耗定额，这种情况说明，经过工人群众的努力，旧的定额已经普遍达到了。为了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需要通过群众讨论，制定出新的定额，树立起新的努力目标。这种倡议，反映了我国工人群众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加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迫切愿望。因此，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修订定额这件事，并不是在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确实，在现阶段，工时定额等等，还是衡量劳动者为社会付出多少劳动量的一种尺度，还是按劳分配的一个依据，但不是全

部依据。有些人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利用定额搞什么物质刺激，搞什么奖金，这就是在扩大这一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他们不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也不经过群众的讨论，企图把定额同物质刺激、奖金挂钩，这就必然会把群众引向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然要受到挫折，有些人甚至会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不愿意帮助别人，共同前进。他们掌握了什么技术，也不愿意公开，生怕拿不到更多的奖金。这样下去，不但会阻碍生产的发展，而且是对工人队伍的腐蚀。对于这种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行为，广大工人群众历来是反对的，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统一的尺度来计量劳动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恩格斯：《论权威》）不过，这时计量劳动的统一时间尺度，已经不同任何个人取得消费品的份额联系，因而也不再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以上看法，供你们进一步讨论参考。

叶伯乐

# 漫话私有制的起源

康 立

建议同志们读两本书：一本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写的《古代社会》，出版于一八七七年；另一本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谁也弄不清私有制的产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直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方才初步揭开了这个历史秘密。摩尔根通过对北美印第安人亲属制度的实地调查，生动而细致地阐明了原始社会制度的特征，论述了私有财产观念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历史。摩尔根的卓绝发现，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很喜欢《古代社会》这本书，不惜花费近十个月时间对它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还准备自己写一部关于原始社会的著作。但一年后，伟大导师马克思不幸与世长辞，写作计划未能实现。恩格斯继续着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终于在一八八四年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从此，关于原始社会及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才得到了真正科学的说明。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用雄辩的事实论证了世界上各个民族在自己的童年时期，都经过漫长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中国呢，也不例外。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如果从北京猿人算起，大约在五十万年左右时间内，除了最近四五千年外，我们的祖先大部分是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中度过的。

当年的北京猿人，劳动、生息、繁殖在北京周口店一带。他们住在龙骨山的山洞里，已经懂得用火，并使用粗糙的打制石器（旧石器），同大自然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从北京猿人起，中经广东的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内蒙和陕西的河套人，直到距今五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大体上都是属于蒙昧时期的人类祖先。韩非在《五蠹》篇中认为，“上古之世”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指的就是这个时期。到了七八千年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开始有了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传说中神农氏“以石为兵”，广泛使用石斧、石刀、石镞（箭头），还“斫木为耜，楛木为耒”作农具，开始垦荒种地，种

植五谷，并且亲尝百草，发明了医药。《商君书》指出：“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韩非和商鞅论述过的有巢氏和神农氏的时代，大体上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渔猎阶段——蒙昧时代和农业生产阶段——野蛮时代。当时，人们“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过着原始公有制的生活。

关于若干万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今天可以根据考古发掘和传说来推测。此外，对近代民俗学资料的剖析，也是研究原始社会史的重要方法。马克思说过：“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一把了解我们自己的原始时代的钥匙。”透过我国东北兄弟民族鄂伦春族人在解放前的生活画面，可以由此推知远古原始社会的许多情景。鄂伦春族长期过着原始的狩猎经济生活。一个个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氏族公社，稀落地散布在人迹稀少的深山峻岭中。他们成群结伙地外出打猎。身强体壮的冲锋在前，捕捉野兽，跟随着的妇女或体弱年幼的，则负责做饭、剥皮毛、晒兽肉等事务。集体猎获的野兽，平均分配，各得一份。至于一些稀少而又好吃的野兽，不够平均分摊，怎么办呢？那就在集中烧熟后，由每个人都来尝一点。这种颇为有趣的风俗，一直保留到解放前才逐步消失。在分配时，老、病、伤、弱的人都得到了特殊的照顾，而负责指挥和分配的狩猎长却往往拿的是最少最差的一份。看，这是一种多么质朴的制度呵！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工具简陋，个人力量太小，只能进行共同劳动，因而形成了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这就决定了对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公有制。读者们可以想一想，象早期鄂伦春人那样地使用简陋的石器或弓箭，在茂密的深山老林中，去同凶猛的野兽搏斗，靠单独的个人怎么能行呢！当时，人们猎取的食物仅够填饱肚皮，甚至在野蛮时代的初期，固定的财富也还是少得可怜。原始人天天要为重新获得食物、维持生存而奋斗。由于人们的劳动还不能生产出超出维持它的费用的显著的余额，因而只能实行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公有制。

阶级的产生和私有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随着原始畜牧业和农业的出现，引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来源。猪、羊、牛、马和骆驼等畜群的繁殖，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充裕的肉和乳。这些新的财富最初仍属于氏族集体公有。但是，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为私有制的出现准备了物质基础。恩格斯指出：“对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发展起来了。”在原始社会里，最早成为私有财产的是动产，主要是牲畜等。因为这些东西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既可食用，又

可用来交换，“它们能无限地繁殖，拥有它们便给予人类心灵以关于财富的最初的概念”（《古代社会》）。地下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经常看到用猪的脰骨作为殉葬品，有的很少，有的多达几十块。可见，当时已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的分化。

私有财产的出现，贫富的悬殊，首先是由于分配上的差别引起的。恩格斯指出：“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原始社会后期，那些劳力强的人以及氏族首领，往往认为自己出力多，消耗大，要求多分得一些东西，大家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例如鄂伦春族，由于马匹的使用和其他狩猎工具的改进，猎取的产品大量增加，分配的形式也就逐步发生变化。奔波于生产第一线的猎手们不再满意旧的分配方式了。于是，由原来的按氏族成员平均分配逐渐改变为按猎手平均分配。对于随同出猎而做辅助工作的妇女，只给予半份或者更少的报酬。不过，如果是寡妇，则可以拿到和男人同样的一份。这个事实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配上的不平等，一些人通过分配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日长月久，大量积蓄的剩余产品成为某些人的个人财富。特别是一些氏族首领利用管理公共财产的机会，凭借掌握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从中渔利，乘机中饱，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剩余产品。到原始公社解体的时期，到处可以看到畜群作为族长、家长的个人财产的现象。当然，那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所以，恩格斯称之为“特殊财产”。所谓“特殊”者，是说它已不同于过去的公共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的萌芽形态。

私有制的产生，同个体劳动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过去，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单独个人和个体家庭是无法独立生活的。原始畜牧业和农业兴起后，人们只须进行简单的看管和耕种，就可以获得比较可靠而稳定的生活资料的来源。于是，个体劳动成为可能，并开始逐渐地代替共同劳动。正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形成了一批批新的私有者。这些人首先把原来属于集体所有而归个人长期使用的生产工具占为私有，接着进行了为个人发家致富的生产活动。让我们继续着鄂伦春人的例子吧！他们尽管仍然停留在以狩猎为主的阶段，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慢慢地游离出一些单干户。开始时，在集体出猎的空隙时间里，个别人到附近山里打点野味，当天来回。后来，有的打猎本领比较高的猎人，干脆脱离集体，长途跋涉，终年单独出猎。他们所猎获的东西，开始的时候是要在家庭公社中平均分配的。发展到了后来，兽皮留归自己，兽肉统一分配。最后，不管是皮张还是兽肉，都全归私人所有。不过，那个时候还

保留着原始共产制的遗风，单干户象征性地把少量兽肉切割成小块，分赠给大家。由此可见，随着个体劳动的出现与发展，必然要不断地产生着私有制的因素。

私有制的形成过程，同交换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最早的交换是偶然发生的，比如这个氏族部落在偶然的场合下碰见另一个氏族部落，各自以少量剩余产品进行物物交换。这种交换往往由首长出面进行，用以满足集体的共同需要，并不改变原始公有制的性质。后来，交换成了经常的现象，那些首长们利用代表氏族部落进行交易的权利，把大量财产特别是珍贵的装饰品攫取在手，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只有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后，交换的性质才起了变化，出现了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正如恩格斯指出：“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如果认为商品出世以后，才出现私有制的萌芽，这显然是错误的。其实，当你拿着东西与别人进行商品交换时，就说明这东西已经为你所占有了。商品的诞生恰恰是“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作用的结果。

当然，商品交换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着私有财产的猛烈增加。当着各个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频繁到如此地步，以致直接从事交换阻碍了他们进行生产时，就产生了商人。接着，出现了私有财产的结晶——货币，出现了高利贷，等等。在我国传说中，神农氏时期“日中为市”，已经有了最初的交换。到了尧舜时期，“北用禹氏之玉，南贵江海之珠”，商品的足迹已遍及全国。据说，舜就平过长途贩运的勾当。顿丘这个地方的物价贵，他到那里去出卖货物；传虚这个地方的物价贱，他到那里去收购货物。这反映了当时的商人已经懂得利用地区差价进行投机买卖了。总之，随着商品交换的兴旺，私有制更加猛烈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考察了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分配和流通等各个领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在产生的私有制，代表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关系。我们还必须看到私有制的产生是离不开家庭的。因此，恩格斯在考察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首先是从原始人的婚姻形式和家庭谈起的。在蒙昧时代，实行的是“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的群婚制。对偶婚（这一群体的姐妹同另一群体的弟兄结婚）是跟野蛮时代相适应的。这个时期，“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由于妇女在生产劳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们的采集收获要比男子打猎捕鱼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财产当然只能根据母系继承，而且必须留在氏族内，夫妻之间不能相互继承财产。从河南仰韶村出土的几百座墓葬来看，没有发现一对成年男女合葬或父子合葬的情况。全都是男子或女子分别合葬或母子合葬，这说明仰韶



文化的人们遵循着母系氏族的外婚制，男女之间只在一定时期结成比较固定的对偶家庭。随着男子在经济上逐渐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大量财产主要掌握在他们手里。于是，按母系计算世系和母系的继承权被废除了，确立了按父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因为只有在这种家庭形式下，才能明白无疑地确定父子关系，才能由亲生的子女来保存和继承父辈的财产。父权制代替母权制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因为它标志着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

从这时起，私有财产在家长制家庭中代代相传，不断积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逐步地把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也都包括进来了。这样，个体家庭逐步摆脱了对氏族的依赖而独立，并且以威胁的姿态同氏族相对抗，成为瓦解原始公社制度的重要社会力量。但是，私有制的发展并没有给每一个家庭都带来福音，却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两极分化。一些家庭成了富裕户，另一些家庭则陷于贫穷破产的境地。例如，鄂伦春族在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形成后，两极分化十分激烈。有的人一户拥有马近百匹或几十匹，有的人一户连一匹马也没有。少马或无马的人家在出猎时，开始是向亲友借用，后来就逐渐出现了出租马匹的剥削现象，从而“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这说明，私有制的发展带来了贫富不均，造成了剥削、压迫和奴役。这种情况发展的结果，导致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大分裂，形成了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对立阶级。所谓文明时代的曙光终于出现了！在中国，这就是传说中继神农氏之后的黄帝时代。《史记》记载：“轩辕（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商鞅也指出，神农氏死后，出现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的局面，反映了氏族社会末期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产生。于是，黄帝适应形势的变化，建立了“甲兵”、“刀锯”，确立了“君臣上下”的等级，出现了奴隶主专政国家的雏形。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变化。同私有财产世袭制的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社会职务的世袭制也产生了。我们知道，从前每一个氏族都具有选举和撤换酋长的权利，酋长职务决不是在一定的家庭里继承的，因为那种世袭制是同氏族内部平等的秩序不相容的。从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确立后，经济上的贫富差别必然引起政治上的地位不平等，酋长们不再是氏族社会的公仆，而变成拥有特权的统治者。他们的职务尽管形式上还通过选举产生，实际上却由那些富有的显贵家庭所垄断。他们不仅竭力维持自己的特权，而且千方百计地把它传给自己的子女。对于这种情况，“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王权世袭制的出现，表明私有制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以后终于确

立了。

我国古代的许多传说，就反映了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据说，部落联盟首领尧克尽公职七十年，近退休时，把四岳请来，要他们不分贵贱亲疏推选继承人。有人提议尧的儿子丹朱接替位置，尧严肃地加以拒绝。后来，有人又提出一个叫舜的氏族成员，尧表示同意，就派舜到一个艰苦的地方去经受三年的考验和锻炼，最后才由他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职务。同样，舜在位四十八年，南巡时死于九嶷山，有人提议舜的儿子商均继位，但经过部落会议协商，一致决定把职位给治水有功的禹担任。这种所谓“禅让”的氏族民主选举制，实质上是原始公有制在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上的反映。但当时两次提出了由儿子继承父亲职位的问题，说明要求建立世袭制的社会力量已在兴起，只不过还没有取得胜利罢了。到了禹的时期，部落首领的权力更大了。有一次禹召集各部落首领开会，“防风之君”迟到了，竟遭到了斩死的处罚，完全是一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架势。部落联盟首领有了那么大的权力，世袭制当然也就容易实行了。所以，当禹东巡死在会稽后，职位就由他的儿子启继承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父子相传代替“禅让”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革新运动。正因为这个缘故，引起了维护旧制度旧传统的社会势力的激烈反对。有个叫益的部落首领带头闹事，结果被启砍掉了脑袋，以失败而告终。世袭制终于胜利了，从此，开辟了奴隶制时代。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由启开创的夏王朝，是我国古代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第一个奴隶主国家。它的兴起宣告了我国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结束。

历史证明，私有制从原始社会中产生出来以后，先后经历了奴隶主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三种基本形式，而最后则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今天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残余、某些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所有制还存在着，私有制观念还象锁链一样束缚着不少人的头脑，还有着死灰复燃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造成私有制和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光有一代人的努力还不行，而是必须把革命的接力棒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革命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但只要 we 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一定能够最后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在地球上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 2 - 1 = ?

## 沪东造船厂船体车间“雄鹰”班

2-1=?，这是道简单的算术题。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的加减法却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么简单。

年初，厂里有一批工人支援内地建设去了。我们“雄鹰”班及战友“猛虎”班的人员都减少了将近一半。有人讲，“鹰”飞了，“虎”跑了，生产任务能完得成吗？于是，围绕着生产任务和人员的矛盾，各种各样的加减法都出来了。有的说：2-1=1，人员减一半，生产任务也只好减一半，有的则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学理论，作主人，人员减一半，生产照样上，来个2-1=3。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运用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去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经过努力奋战，终于提前把“神州”、“长白”两条万吨轮双双推下了水。大家都说，这次减人又增产，是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革命的加减法。

2-1=1，从书本上来看，这是明白无疑的。可是，实际工作中的加减法就复杂得多啦！有时，我们车间人员减少了，有关部门也相应地拉掉了一些任务，但有些干部因为减了人而泄气，结果一松百松，连调整后的计划都完不成。可见，弄得不好，很可能是2-1=0。相反，有时人员增加了，但少数干部因此产生了“笃定”思想，不去充分发动群众，结果呢，等工窝工的情况很严重，增人不一定增产。可见，也未必就是2+1=3。归根到底，书本上的1和2是死的，实际工作中的1和2却是活的。在组织生产时，算死账就往往要失灵。在社会主义企业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对于人们积极性的发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毛主席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里说的人，既是指人数，又是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我们讲减人也



能增产,就是说要注意创造条件,使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大战“神州”、“长白”两条万吨轮时,全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热火朝天。这股强劲的东风吹暖了每个工人的心头,激发了广大工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加速铺设“海上铁路”的革命热情,许多历史上最高的生产纪录都给刷新了。我们工人同志看到各级领导干部也拿起焊枪来到船台,顶着烈日和大家一起爬高摸低,心里更是暖呼呼的。过去要几个人干的工作,现在往往一个人就顶上了;过去组与组、部门与部门之间经常扯皮,现在是“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互相协作,共同推动生产的迅速发展。这就说明,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生产上的潜力,决不是书本里的加减法所算得出来的。只要我们执行的路线对头,生产上别说是 $2-1=3$ ,就是 $2-1=4$ , $2-1=5$ 都不是没有可能。比如,过去万吨轮上的舷部大接头一直是靠手工焊接的,八名工人一天才勉强能焊完一个。“神州”、“长白”上马后,工人同志说,人员减少了,生产不能少。怎么办?只好“逼上梁山”搞革新。现在采用了“垂直自动焊”的新技术,生产效率一下子就提高了四倍。毛主席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我们工人就喜欢演算这种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革命加减法。面临着减人和增产的矛盾,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促进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革命的转化。

2-1=7,大家都来认真地想一想这个问题吧。

## 没有想到……

上港一区 任慈杰

前不久,从报上读到工农兵大学毕业生程立标的事迹,其中提到程立标的女友听说他不准备留在省革委会工作而坚持回农村时,竟惊得目瞪口呆地说:“没有想到你会这样!”最后,两个人谈崩了。

他俩之间的关系后来怎么样了？不得而知。但这件事却颇能发人深思。“没有想到你会这样”，说得明白点，就是没有想到你会不当干部当农民，不留城市去农村，不提笔杆扛锄头。不是吗？前者待遇高，收入多，后者待遇低，收入少。这把小算盘不用拔拉就很清楚。看来这位女青年存胸中已经把“小九九”打过好几遍了，才选上了这么一个能当干部、留城市、提笔杆的对象。不料程立标偏要下乡务农，坚持为社会主义扛锄头，她不由得要惊呼“没有想到你会这样”了。在这里，职业、收入、地位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定的恋爱观从属于一定的世界观。资产阶级把一切当作商品；男女关系在他们手里必然就强烈地表现为商品关系、金钱关系。我们不想在这儿责备那位女青年以及具有类似思想的某些青年人，但所谓“没有想到”的恋爱观，实质上正是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的结果，这却是事实。

对此，怎么办？很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也有一段关于“没有想到”的对话。十月革命后，林务官的女儿冬妮娅与红军战士保尔在工地上相遇了，当地知道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劳动者就是两年前的密友时，大失所望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弄成这样”。保尔可回答得好，“同样，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这么酸臭。”资产阶级恋爱观想到的是金钱、地位，还有根据商品交换原则而来的其他什么别的，如军火陈设之类。而无产阶级战士对这些却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恋爱对象是否具有共同的革命目标和革命思想。无产阶级的恋爱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体现，即使是男女相爱吧，也应当建立在为革命事业而共同奋斗的基础上，决不能去片面强调“爱”的生物性，更不容许资产阶级的商品交换原则在这个领域内猖獗活动。恋爱关系也是一种阶级关系，应当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青年中已蔚为风气，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风尚逐步取代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尚。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无产阶级思想是在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有些青年，比如那位女青年，即使在思想上暂时还不能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只要我们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引导他们批判资产阶级，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那末，错误就有可能转化为前进道路上大有裨益的教训——这也是完全可以想得到的。



# 鲁迅传

石 一 歌

## 第九章 女师大事件

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口，有一座经常关闭着黑色铁门的楼房，这就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一九二五年，在南方风起云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浪潮的影响下，这里爆发了震动整个北京城的“女师大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帝国主义、封建官僚和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同盟，同日益发展的人民革命力量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较量。

女师大的校长原许寿裳，鲁迅就是应他之聘在女师大兼课的。一九二四年三月许寿裳去职，继任的叫杨荫榆。这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的奴才，她那披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就象幽灵一样在校内到处晃动，成天向学生灌输的，是她从美国学来的那些反动的资本主义思想垃圾和孔孟之道的混合物。她把学校比做“家庭”，把自己当作“尊长”，结党营私，飞扬跋扈，竭力在校内实行封建统治和高压政策。有一件事特别使学生们感到愤激，她竟然阻止女师大学生请假去参加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公祭大会，理由是：“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公妻的，你们学了他没有好处，不准去！”杨荫榆说出了当时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

但是，黑色的校门挡不住时代的激流。一九二五年年初以来，工人反帝斗争一浪高似一浪，上海纱厂大罢工刚刚结束，青岛纱厂工人的大罢工又接着爆发。在这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风暴的推动下，女师大的学生们起来造反了，她们发表宣言反对杨荫榆当校长，决心砸烂那拘囚她们身心的牢笼，驱逐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代理人。

杨荫榆于是就准备下毒手。

五月七日是“国耻纪念日”，十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要求承认“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学校在这天布置了一个演讲会，早已被学生否认的杨荫榆竟悍然登台，要以校长名义亲自掌握会议。杨荫榆这一无耻行为激起了全体学生的公愤，她们群起反对，报以一片嘘声。杨荫榆狼狈不堪，诬蔑学生破坏“国耻纪念”，厉声高呼：“叫警察！”学生毫不退让，竟起责问，杨荫榆见势不妙，偷偷溜出会场。当天下午，杨荫榆立即召

集党羽开会，密谋迫害学生。九日清晨，贴出了一张布告，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代表。

杨荫榆的横蛮手段激起学生强烈的反抗，她们一看到贴在墙上的开除学生的布告，立即在操场上集合，排队到办公处示威，当场宣言：“全体学生是拥护我们的代表的。”她们公推十位同学去见杨荫榆，要她到会辩论，可是杨荫榆早已闻风潜逃了。于是学生们更加愤怒了，许广平是自治会的总干事，同学们要她亲自拿封条去封校长办公室。

许广平执行了大家的委托，把校长办公室封了。

今后该怎么办？学生们富有斗争精神，但还缺乏经验，有的因气愤和忧虑而哭了起来，有的和自己的代表们一起考虑着下一步的对策。她们是多么希望进步教师站出来指导她们，和她们一起战斗啊！

正在这一时刻，鲁迅和许寿裳等进步教师挺身而出，坚决表示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

五月十日，鲁迅首先用杂文愤怒地揭穿了杨荫榆及其同党媚上压下的丑恶面目，号召学生针锋相对地进行还击，因为只有这样，“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得到鲁迅的支持，学生们活动得更积极了。一天，鲁迅接到一个由学生自治会召集会议的通知。但是，当他下午去开会时，在那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两位教员坐在那里。

“先生的意见是怎样？”一个教员问。

“我个人意见，是反对杨先生的……”鲁迅的话还没讲完，那位教员就已经不耐烦地摇头了。

鲁迅知道自己是遇到杨家的人了，和这些人实在无话可说。但开会的人怎么还不来呢？一低头却发现桌上有一张印刷品，是杨荫榆发的通知，说什么学生自治会召集教师开会，“无此学制，亦无此办法”，并公然唱对台戏，通知教员到太平湖饭店开紧急会议。看了这张纸条，鲁迅才知道学生自治会召集的会议已经受到了杨荫榆的破坏。

从学校回到家里时，已经黄昏了。鲁迅想着下午的事情，心中无比愤怒，他仿佛看到在太平湖饭店里，杨荫榆一伙正围着桌子吃着丰盛的菜肴，在杯酒间就决定了青年学生们的命运。

鲁迅感到杨荫榆的“手段太毒”，必须发表一个宣言说明真相，给这些“暗中活动之鬼”以迎头一击。五月二十七日，鲁迅联合许寿裳等七位师员拟了一篇《对于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严正声明对女师大事件的态度，抗议杨荫榆对学生进行迫害，呼吁“关心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密切注意杨荫榆的动态。

宣言在《京报》一发表，杨荫榆的狐群狗党立刻反扑。

“现代评论派”也出场了。凭着特有的反革命敏感，他们知道，女师大虽小，势在必争；闹学潮之例，断不可开，否则发展下去必定危害反动统治秩序。因此，他们决定公开支持反动的学校当局。

和鲁迅等人发表的宣言相隔仅三天，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闲话》，他装

出局外人的姿态,说什么女师大学生“闹得太不象样了”,把学校弄得象“臭毛厕”一样,丢尽了“教育界的面目”;说什么鲁迅等人的宣言“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并放出流言说风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要“当局”“切实调查”,加以“相当的惩罚”。谁都明白,他所说的“某籍某系”,是影射当时以鲁迅为中心的进步力量,他们是多么迫切地要求反动当局来迫害鲁迅啊。

这,并不能“吓哑”鲁迅。当天晚上他就写了《并非闲话》一文,尖锐地指出:在现实社会中,“偏袒”是“在所不免的”,陈西滢一伙装作不“偏袒”一方,恰恰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鲁迅说,丢尽“教育界面目”的不是青年学生,正是他们这一小撮“蛆虫”!

正当这场斗争深入展开的时刻,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了。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多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屠杀、压榨和剥削,举行集会,英帝国主义巡捕房非法逮捕参加集会的学生一百多人。这个暴行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恨,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南京路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可是英帝国主义巡捕却竟然向群众开枪射击,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立即举行了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反帝怒潮汹涌澎湃,奔泻千里。

五卅运动给战斗中的鲁迅以极大的鼓舞。他十分关注由“五卅”引起的反帝运动的进展,还主动捐了一笔钱支援各地学生的反帝斗争。他一连写了好几篇杂文,指出这次“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就使“伪文明人的真面目显露了”,他号召青年学生扩大视野,不要把自己的目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学潮”,而是要坚决投身到当前反帝斗争的风暴中去经受“磨练”,并且驰而不息,“永远这样的干下去”。

当时,一些被帝国主义枪弹吓昏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一次次向刽子手们辩解,我们没有“赤化”,我们不是“暴徒”,为什么要打我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鲁迅在六月十一日写的一篇杂文中严厉批判了这种行径,勇敢地说:

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

而且又进而指出,帝国主义之所以对我们如此凶残,国内这些人之所以如此软弱,“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这些思想,不仅反映了鲁迅一以贯之的彻底反帝精神,而且也表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又一次促使他对当时被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的“赤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产生了进一步的感情。

五卅运动也使鲁迅的对手惶惶不安了。还在拼命写文章为杨荫榆保驾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们,迫不及待地抽出笔来,大叫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陈西滢干脆咬牙切齿地说:“我不赞成高唱宣战”,他居然嘲笑被美国兵殴打而敢于反抗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呸!”对此,鲁迅尖锐地指出,他们是要“中

“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他针锋相对地对这批奴才投以十倍的蔑视：“这样的中国人，吓！吓！！！”

五卅的反帝巨浪也迅速提高着女师大学生的政治觉悟，她们把反对反动学校当局的斗争和声讨北洋军阀媚外卖国的运动连结在一起。她们多次参加北京各界举行的反帝集会游行，还在校内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准备用实际行动声援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搏斗。

就这样，女师大的风潮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风暴汇合起来了。杨荫榆自然更加害怕，她在新平路密设了一个“女师大校长临时办公处”，一面借口暑假校舍要进行修理，不准学生住校，一面又卑鄙地劝阻学生请来讲习护理知识的医生进校。并贴出布告解散学生自治会。

这些鬼鬼祟祟的阴谋活动，都被学生看穿并粉碎了，于是杨荫榆愈加疯狂，她要 and 革命力量决一死战了。

八月一日清晨，杨荫榆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干脆带着军警打手百余人，蜂拥入校，强占校长办公室，学生坚决抵制，毫不屈服。杨荫榆索性下令关闭伙房，截断电路，封锁校门，妄图断绝学生和各界的往来，把她们困死在校中。

在这最紧张的关头，鲁迅来到了女师大，他和学生们站在一起，隔着学校铁门和外面站着的密密层层的军警相对峙。当晚，鲁迅又毅然和一些进步教师留宿在女师大教务处办公室，准备应付不测。

在八月份短短一月中旬，斗争形势在急速发展：

八月六日，教育总长以“学纪大紊，礼教全荒”为理由，在北洋军阀的国务会议上提议解散女师大，并当即下令执行；

八月二十二日，军阀政府派出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雇用了上百个打手，打入女师大，用武力将学生架出校外，不少学生被毒打受伤；

八月二十五日，“临时执政”段祺瑞亲自出马，发出了“整顿学风”的命令，声称“教育为国本所托，中央乃政令之源”，“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便“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封建势力象乌云一样往进步青年头上压了过来，严酷的阶级斗争考验着每一个人。在这风狂雨猛的时刻，胆小怕事的，明哲保身的，看风使舵的，都纷纷退却，逃之夭夭，但鲁迅仍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他和许寿裳等组成“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会”，坚决抵制北洋政府解散女师大的反动措施。他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流言和谎话》等杂文，批驳反动派的种种诬蔑和谎言。当社会上传出反动政府正在搜捕学生代表、准备用警察把她们押回原籍的罪恶阴谋时，鲁迅怒不可遏，对学生们说：“来我这里不怕！”他让学生到他家里避难，警察来到西三条胡同，都被他顶了回去。

于是，鲁迅也就成了反动势力的眼中钉。他们千方百计要陷害他。先是派人向鲁迅说：“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女师大的校长。”鲁迅对此嗤之以鼻；软的不行又来硬的，八月十三日，教育部下令免除鲁迅教育部金事的职务。

但是，鲁迅仍然迎着敌人的锋刃而上。反动派免了鲁迅的职，鲁迅便用“即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根据当时“法律”规定教育部无权免金事之职的条文，向平政院控告。石驸马大街的校舍被暴力占领了，鲁迅就带领学生们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九月二十一日，宗帽胡同的新校开学，鲁迅发表了演说，他对同学们说：“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死亡，压力是压不倒人的。”

九月的北京还是很热的，鲁迅在大热天中来回奔跑于西三条胡同和宗帽胡同之间，加之这几个月来的紧张、劳累，肺病又复发，在参加开学典礼后就卧床了。他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上记着：“午后发热，至夜大盛。”但是鲁迅仍然抱病上课，并主动要求把任课时间增加一倍。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大量文章，揭露“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们的假面。

军阀政府和“现代评论派”种种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了社会上各阶层进步人士的愤怒。北京大学教师首先召开会议，议决与北洋军阀教育部脱离关系。接着，代表北京九十八所学校的学生联合会在报上公开发表启事，痛斥北洋军阀教育部“近日复受帝国主义之暗示，必欲扑灭学生运动而后快”。

反动派看到，单用高压手段对付青年是不济事了，于是又想出了新的花招，妄图搬出一些所谓“理论”、“主张”来对抗学生运动。就在群众反帝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刻，一种直接由教育部创办，叫做《甲寅》的周刊突然出版。这本封面上印着一只面目狰狞的老虎的刊物，一张口就声称：“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还叫嚣什么新文化运动“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后来，军阀政府又通过这个刊物发动了“读经救国”运动，甚至利用行政手段规定从初小四年级就要开始读经，再一次想用孔孟之道把人民革命运动的烈火浇灭。

不久，胡适也跳出来配合，他在《现代评论》上写了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提出了救国必先求学的荒谬理论，说什么“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真是尽了爱国的责任”。他别有用心地向青年们讲了歌德和非希特怎样在兵临城下的时候，还埋首读书著文的故事，“劝告”青年们不要受“外间刺激”，而是要去“用心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

读经能够救国？鲁迅说，在欧战期间，谁见过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他认为，那些“正人君子”也并不相信读经可以救国，教育总长坐朝论道“读经救国”，大学教授现身说法“救国必先读书”，一吹一擂，都是“别有用意”的。

当时有些人看不出这“用意”，竟花了许多笔墨和他们“评道理，讲利害”，鲁迅反对这种做法。为了及时粉碎《甲寅》和“现代评论”派的联合攻势，使广大青年免于上当受骗，鲁迅连续写了《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碎话》、《这个与那个》等杂文。

鲁迅当众宣告：“读经救国”只是一种政治阴谋，尊孔、崇儒、专经、复古这些“把戏”，完全是一种“将人们作笨牛看”的愚民政策，完全是为了从根本上腐蚀广大青年的革命斗志，使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结果“老死在原地方”。

总之，北洋军阀及其走狗们武的一手没有成功，文的一手也没有奏效。一九二五年年底，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东征取得胜利。在南方革命浪潮的鼓舞下，北京

人民接连爆发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驱逐段祺瑞”的口号声响彻全城。愤怒的群众冲破了反动军警设置的防线，连“京师警察厅”的牌子都给游行群众取下来了。在人民群众斗争风暴的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最后露出了纸老虎的原形，一些原先身居要职的政客官僚纷纷逃离北京，避居天津租界。在宗帽胡同坚持斗争的女师大学生，终于在十二月十一日，浩浩荡荡地排着队返回石驸马大街原址，正式宣布复校。北京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前来助威。鲁迅和广大青年学生获得了胜利，人民革命力量获得了胜利！

在长达半年多的女师大风潮中，鲁迅的斗争体现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迫切要求，客观上正和南方迅速发展着的革命主流相呼应。

胜利刚刚取得，硝烟还未消散，但是，一个新的战斗信号又在鲁迅面前升起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上出现了一篇林语堂写的文章，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文章说，现在段祺瑞等人已经失败，我们不能“投井下石”，“再施攻击”，而应该发扬“费厄泼赖”精神。（“费厄泼赖”，英语 fairplay 的音译。所谓“费厄”就是对于对手要宽大，不要穷追猛打；所谓“泼赖”就是凡事要抱游戏态度，不要过分认真。）这种从外国贩卖来的论调，骨子里仍是孔孟鼓吹的中庸之道。

问题的提出者不是胡适、陈西滢等北洋军阀的公开走狗，而是当时还似乎置身在进步营垒里、并在鲁迅所拟的那个“宣言”上签过名的林语堂！这就更加使人迷惑：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敌人？要不要将斗争进行到底？

其实，“费厄泼赖”这股逆流还在几个月前就冒头了。五卅运动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迅猛发展，使一些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折中的面目，“宽恕”的论调来阻挡这场革命的进行。例如周作人说：“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之养成”，“以前的事情，我们不必再提罢。”应该怎样呢？他的回答是：“反抗自己”比斗争敌人更重要；“必先克己”，“凡有革新皆从忏悔生的。”

鲁迅早就在激烈的战斗中警惕着这股逆流，待看到林语堂的文章以后，更加感到他们宣扬的这一套中庸之道的危害性。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前夜——十二月二十九日，他怀着将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责任感，写下了著名的论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在这篇文章中，针对着林语堂“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的论调，鲁迅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必须痛打落水狗！

鲁迅拉开历史的帷幕，向人们展示了辛亥革命中“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许多惨痛教训。鲁迅思索已久的这些历史教训，在近几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烈火中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规律：如果对鬼蜮慈悲，将来“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于是，他写下了这样明确的论断：“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对它们绝不应抱有幻想，只要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正是基于对敌人反动本性的深刻认识，鲁迅提醒人们，不要被一时处于劣势的敌人装

出来的可怜相所迷惑，不要因胜利而松懈斗志，不要把敌人一时“失足”看作已经“塌台”，更不要把他的“落水”，当作“受洗”，以为已经“忏悔”，“不再出而咬人”。他们“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侧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其实，他们的巢窟早已造好，“都在租界里”，只要时机一到，就要卷土重来屠杀革命者的。鲁迅谆谆告诫人们，对阶级敌人绝不能讲中庸，绝不能手软，千万不能有“哀矜之意”，不能对他们讲“公理”，不能一味“费厄泼赖”，而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还维妙维肖地勾勒出鼓吹“中庸之道”最起劲的胡适、陈西滢以及林语堂之流的脸谱：“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给了他们一个绝妙的名称：叭儿狗。根据几年来斗争实践，特别是根据半年多女师大风潮期间的斗争实践，鲁迅清楚地看到这些“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叭儿狗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坏人得势的时候，他们伪装公正，粉饰太平，竭力维持现状；而当坏人行将落水之际，他们就大叫大嚷什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最后使好人上当，坏人“得救”。鲁迅深恶痛绝地指出，对这种叭儿狗绝对不能“宽容”，“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

鲁迅后来把这篇文章收进了自己的杂文集《坟》。在《写在“坟”的后面》一文中，他特别指出：

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是的，这是用鲜血写成的宝贵文字，这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长期斗争中的经验结晶。同时，这也是鲁迅思想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所体现的思想，捍卫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处处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因此，在以后几十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历程中，它曾无数次地激励和鼓舞了广大革命者的斗争意志。这篇文章的出现，表明鲁迅正酝酿着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

鲁迅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身体力行“痛打落水狗”的革命原则，继续狠批北洋军阀及其走狗。敌人招架不住了，放出了“停战”的烟幕。一九二六年二月，“现代评论派”分子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写文章，说什么大家都是“大学教授”，不该“混斗”下去，他要“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鲁迅完全明白他们的用心所在，他大声地回答他们：

“我还不能‘带住’！”

## 第十章 “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发表不到三个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卖国政府门前又一次响起了屠杀革命群众的枪声，一场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

敌人的血腥暴行，又一次证明了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所坚持的革命原则的正确性。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处心积虑地镇压“五卅”以后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必然结果。在英、美、日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一九二六年三月，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同情革命的国民军冯玉祥部。

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北京。黄尘扑面的街市中，只见一辆辆装着伤兵的兵车飞驰而过，一队队国民军急急地往城外开去……

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同国民军作战的奉系军阀，派出两艘军舰掩护奉军闯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帝国主义便以此为借口，在三月十六日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国民军在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并撤除防务。他们还气势汹汹地勒令段祺瑞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即十八日正午前作出答复。

消息传来，北京人民愤怒极了，纷纷要求执政当局拒绝八国通牒。十七日，一场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运动在北京各界，特别是在各个学校里准备着。而在铁狮子胡同段祺瑞卖国政府的大楼里，也在紧张地策划着一次血腥的屠杀。

国民党右派得悉段祺瑞的阴谋，为了和反动军阀一起摧残革命力量，也别有用心地“动员”人们去请愿。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右派于右任就曾经对女师大的学生说：“你们尽管去，黄花岗烈士中也没有一个女的，你们去干吧！”阴险地配合段祺瑞政府布下的诱杀的罗网。

十八日一清早，四千多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冒着大雪，到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投降行径。会后，他们示威游行至执政府请愿。坚持过长时间斗争的女师大学生，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扛着大旗走在她们前面的，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

请愿队伍刚到执政府门口，段祺瑞就命令卫队开枪，并阻塞通道，两面夹攻，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牺牲四十七人，其中有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伤一百五十余人；还有不少人“失踪”，其实也是牺牲了。

又是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当时人们曾经这样悲愤地唱道：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天半黄尘翻血花！

几个月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全国各地制造的一个个暴行在鲁迅心头积蓄着越来越强烈的愤怒。今天，执政府前大屠杀的消息刚传来时，鲁迅还不大敢相信，他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消息被证实之后，鲁

迅再也压抑不住了。当晚，他写了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激愤的言词如同开了闸的急流奔腾而出：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象。

.....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以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在这篇杂文的末尾，鲁迅写下了写作的日期，他把这个血腥的日子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政府一方面推卸罪责，诬蔑参加游行的群众为“暴徒”；一方面又加强镇压，于三月十九日发下一道通缉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命令。他们制造假现场，混淆视听，胡说群众游行请愿是搞什么“暴动”。对此，“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心领神会，他们在惨案后不久出版的一期刊物上，用了几乎全部的篇幅，把矛头指向人民群众。其中，尤以那个前不久还宣布“不管闲事”的陈西滢更为卑劣。他在一篇《闲话》中，竭力为段祺瑞政府开脱，恶毒污蔑学生是“受人利用”、“自蹈死地”，说什么“暴徒首领”应负“道义上之责任”，等等。

封建军阀及其走狗要继续耍弄花招，这本在鲁迅意料之中；但他们无耻的程度，又有点出于鲁迅的意料之外。他气得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些友人去看他，他怀着极度的悲愤，久久才迸出一句话：“我们对这件事决不能沉默。”

对反动派诬蔑群众游行是搞什么“暴动”的说法，鲁迅无情嘲讽，严加痛斥。他说：“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枝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针对着陈西滢之流的种种污蔑，鲁迅写道：“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在指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以后，鲁迅又寓意深长地说：“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

鲁迅这样说，是因为他已看到“中国人的大多数的意见”正和段祺瑞、陈西滢之流相反。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段政府是

“卖国凶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用革命行动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连日来，北京各界群众，冲破敌人的种种威压，纷纷集会、游行，哀悼死难烈士，声讨敌人的罪行。这一切，给正在寻求革命力量的鲁迅带来了多大的鼓舞！因此，他豪迈地宣告：“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三月二十五日，女师大为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等召开隆重的追悼会，鲁迅也前往参加。

死者的遗体安放在灵堂上，她们的身上还留着许多棍棒的伤痕。她们在反动派屠杀的时候临危不惧，互相救护，表现了中国革命青年的大无畏精神。杨德群是身受重伤救护无效，在医院里去世的；刘和珍是当场被打死的，而且遗体还被执政府扣留了，女师大的师生们经过斗争才把这具遗体夺了回来。追悼会在悲愤的气氛中进行着。刘和珍生前的战友、女师大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举着死者打满补丁的血衣，愤怒地控诉了反动派的暴行和污蔑。

鲁迅目不忍睹，心情无比沉痛。他一个人在礼堂外面徘徊，刘和珍的形象活生生地浮现在他眼前：在艰难的生活中，毅然订下了全年的《莽原》；在女师大事件中，坚决同杨荫榆作斗争因而遭到了“开除”的“处分”；在宗帽胡同上课时，态度是那样的认真，对学校的前途是那样的关切……。鲁迅诧异于这样一个始终微笑、态度很温和的女青年，竟能如此勇敢地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并在斗争中毅然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些什么没有？”一个学生跑来，打断了鲁迅的思路。

“没有。”鲁迅回答。

“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那个学生又说。

几天以后，鲁迅痛定思痛，终于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念文章：《纪念刘和珍君》。

鲁迅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和刘和珍交往的过程，对她进行了热烈的歌颂：“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当她和她的战友们英勇地牺牲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鲁迅认识到：“这样的世界”不是枝枝节节所能改好的，中华民族倘无巨大的、彻底的变革是不会有出路。“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决计踏着烈士的血迹，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用斗争来结束“这样的世界”。他写下了这样铿锵的语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是哀悼，也是控诉；是宣誓，也是号召！



在写作《纪念刘和珍君》的前后，鲁迅还写下了一系列评述“三·一八”事件的杂文，几乎接连不断，三月二十三日写完《死地》，三月二十六日又写了《可惨与可笑》，四月二日写完《空谈》，四月六日又写了《如此“讨赤”》。在这些杂文中，鲁迅反复地表明了自己在这个血腥事件中所获得的思想进展。他自己的概括是：“三·一八”事件使他进一步认识了三种人物，取得了两个教训。

三种人物：“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敌人的凶残和下劣使他决心在“目不忍视”、“耳不忍闻”的现实中“爆发”出更大的斗争火花；革命青年的牺牲精神又使他找到中国人民“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使他在“淡红的血色中”看到了希望，尽管还有点“微茫”。

两个教训：“我以为倘要锻炼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鲁迅说，段祺瑞之流，“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在鲁迅看来，“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他认为：反动派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他们不能搞什么“请愿”的。鲁迅进一步指出：“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

鲁迅总结了“三·一八”事件的意义，指出：这回死者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于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究竟用什么方法，他还在探索，但他觉得至少是不能“赤膊上阵”，而要改用“壕堑战”。

鲁迅对现实的认识因“三·一八”事件而加深了，这事件给他以巨大的震动，也给他以深刻的教育。他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不久，在“正人君子”的配合下，反动当局对鲁迅的压迫越来越紧。段祺瑞政府继第一个通缉令以后，报上又传出了一张范围广至五十人左右的黑名单，鲁迅的名字也列入其中。

四月中旬，在朋友们的劝告下，鲁迅离开了西三条胡同的寓所，搬到莽原社暂避。起初，他白天在里面看书写文章，晚上出来转一圈打听外面的消息。但到第三天，突然有三、四个不相识的“青年”闯到莽原社来，行迹可疑，鲁迅估计他们是化装的暗探，于是就装成病人，移住到一个日本医院中，不久又搬到一个德国医院。由于劳顿不安，鲁迅在德国医院真的生病了。病稍愈，德国医院催他出院，他又转到一个法国医院里。

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在法国医院，鲁迅和同去避难的几个人住在一间堆积什物的地下室里，白天以干粮充饥，晚上在水泥地上睡觉。一起避难的人闲得无聊，总是谈谈天、下下棋，而鲁迅却总是在这种谈天、下棋的人堆旁搭一张小桌，继续工作。有时实在没有地方了，就一个人躲到医院的木匠间里去写作。在这期间，鲁迅继续以匕首一样的杂文批判了反动政府和陈西滢之流，同时还写下了一些回忆性的散文。前些时候，

在女师大风潮的日日夜夜里，那些军阀头目及绅士学者特别起劲地鼓吹封建道德，以此来和进步师生对抗。如今，鲁迅在这些散文中又穷根究底，从历史的回顾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道德的残酷性和虚伪性，指出，孔孟之徒拚命地鼓吹的“孝道”、“节烈”之类的东西，是专门用来对付幼者和弱者的，他们自己并不实行，“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鲁迅把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同现实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揭露了反动派利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来诱杀青少年的阴谋。

避难的生活使鲁迅负债不少，弄得经济无法支持。五月中旬，通缉的风声渐渐沉静下去，鲁迅回到了自己的寓所。

当时，北京的政治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军阀的内哄火并中，段祺瑞被赶下了台，逃到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去了。不久，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和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又相继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军阀们轮番登台，在鲁迅看来，无异于“做戏”，统治中国的仍然是这么一帮子主张“制礼作乐”、“尊孔读经”、见到一个“赤”字就胆战心惊的货色。他在结束避难生活后不久写的一篇杂文中说：段祺瑞等人虽然逃走，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而已，北京依然是他们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们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总之，依然是他们的世界。

回寓以后，鲁迅生了一段时间的病，但他的精神却比过去更加高昂了。那时曾经有几个心怀叵测的“名人”间接“忠告”他，说他去年的文章，“专和几个人闹意见，不再论及文学艺术，于天下国家，是可惜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使鲁迅一针见血的批判变成隔靴搔痒的空头文章。鲁迅看透了他们所包藏的恶毒用心，辛辣地加以嘲讽：“冠冕堂皇的如所谓‘公理’之类，就让公理专家去消遣罢。”在一篇通讯中，他乐观地回忆一年来的斗争生活，嘲笑反动军阀和叭儿狗们的种种迫害阴谋“也没有什么效验”，“仍然于我无损，我还是这样”，“还想活下去”，“还要发点议论”。谈到自己的思想时，鲁迅说：“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他还劝别人把身体搞好些，不要在斗争中消沉，“使精神坠落下去，是不好的”。

北京炎热的夏天来到了。鲁迅任教的北京大学和女师大也都放了暑假。但鲁迅不想停止工作去休息，除了继续撰写杂文外，他开始翻译荷兰的童话《小约翰》。

鲁迅一向重视儿童教育。他曾说，儿童“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未经生活过的”。为此，他曾不断地批判反动派对儿童的摧残和毒害，曾根据当时的条件为儿童收集较为健康的精神食粮。他翻译《小约翰》非常认真。每天中午，总是冒着炎炎骄阳，夹着一个红黑色格子布的书包，来到中山公园一间红墙小屋里，和合作者一起开始工作。为了译得更准确些，他甚至经常与合作者展开激烈的争论。译得“头昏眼花”、“身上一大片汗”时，“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绿荫，心绪渐静”，又继续工作。这样辛勤地工作了约有一个月。

《小约翰》草稿译出，已是八月间。这时，千里之外的南方工农革命的好消息象阵阵春风，吹进了云封雾锁的北京。鲁迅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我想换一个地方，到南方去工作。”鲁迅对友人这样说。他决定应厦门大学的邀请南下了。

听说鲁迅先生要走，和他结下深厚战斗友谊的女师大学生是多么的依依不舍啊！八月十三日，她们特地为鲁迅开了欢送会。二十二日，是段祺瑞解散女师大一周年，女师大要召开纪念斗争胜利的大会，鲁迅虽已辞掉了教职，但仍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演说。在演说中，他批判了小资产者在革命中的软弱性，同时也表明对于未来、对于前面道路的希望。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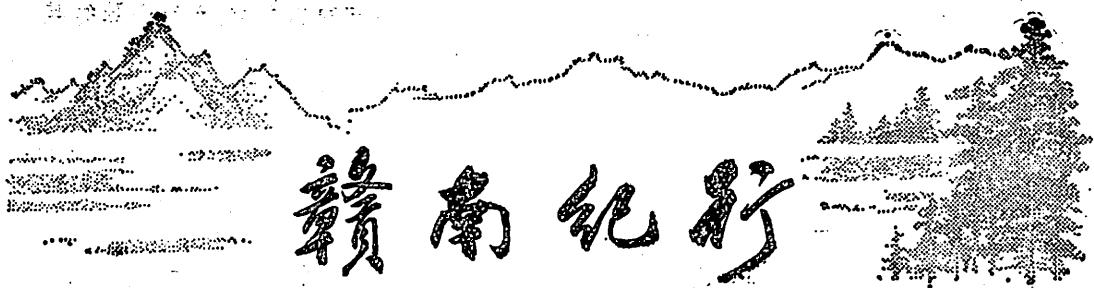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

“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四天后，鲁迅告别了战斗、生活了十五年的北京，乘上了南下的火车。许广平同行。

(续四)



吴文虎 曹溶

## 六、新一代人的决心

现在，我们要到定南县去了。

在公共汽车上，正巧碰上了到定南去抓点的上海学习慰问团赣州地区负责人王康朗同志。他告诉我们，定南县知识青年工作抓得很紧，青年们精神面貌也很好，例如有个月子公社综合场，那里的青年们已计划几年后要办个托儿所！

我们不禁都笑了起来。但王康朗同志并没有笑。是啊，办托儿所有什么好笑呢，这不是说明了我们的青年想得多么远、多么细，他们的扎根思想又是多么牢固！

到了县里，我们遇见了县委副书记曹凤德同志。他是一位热情、爽朗的农村干部，北方人，解放战争时随军南下到这里，当时还是一名青年战士，而现在，鬓角已可看到几丝斑白了。记得去年上海有关部门召开上山下乡的工作会议时，他曾在台上向上海知识青年的家长们发表过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的音容笑貌，不仅是我们，恐怕对上海许多家长来说，也还都历历在目吧。所以，我们这次见到他，也可以说是熟人相逢了。

曹凤德同志拿出茶叶罐子，给我们每人沏了一杯“碧螺春”，看来是想给我们作一次长谈了。但没说几句，有人来找他，就收住了话锋，叫我们先休息一下，临走留下了几份油印材料。我们经过长途跋涉后，感到很疲倦，坐在椅子上随手翻阅着那几份材料。突然，一个醒目的标题跳入我们的眼帘：

### 新一代人的决心

——定南县月子公社综合场全体知识青年 1975—1980 年奋斗规划

下面还注着一行工整而秀丽的字迹：“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八日，全体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讨论通过。”

这不就是要办托儿所的那批青年吗？我们赶快翻开封面，只见第一页上这样写着：

今天是三月十八日，伟大巴黎公社的纪念日。一百零四年前，巴黎公社的英勇儿女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我们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革命青年们懂得，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才是对历史上“无产阶级的节日”的最好纪念。

.....

我们热爱这里的贫下中农，热爱这里的草木山水。在土地革命初期，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带领着中国工农红军在月子江头闹革命、播火种，想到此，我们激情澎湃，责任倍增。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为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呢？

透过这些洋溢着青春爱情的革命言辞，我们似乎看见，高插在巴黎街垒上弹孔斑斑的红旗，飘扬在战歌嘹亮的红军队伍前头的鲜艳红旗，今天正插在赣南山区，插在月子江头，插在千万知识青年的心坎上！奇怪，浑身的疲乏霎时都消失了，我们连忙再去找曹凤德同志，与他商量到月子公社去的行程。

曹凤德同志朗声笑着说：“这可真是一群可爱的‘铁杆扎根派’，是该去看看他们！我也有一阵没去了，一起去。”

这是晴朗的一天，我们和曹凤德、王康朗等同志一起来到了月子公社综合场。走在田边，看到这里刚插下去的早稻秧苗已一片碧绿，和一路上看到的其他水田一样，所不同的是，这里插的木牌子特别多，弯腰一看，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试验项目。可见这里科学种田搞得很热火。我们正津津有味地端详着木牌，田埂上走来一个中年人和一个青年人。曹凤德同志马上向我们介绍，中年人是综合场的党支部书记郑继添同志，青年人是在综合场工作的公社农科所的技术员陈海鹏。

老曹指着那些木牌问了小陈一些农业技术上的问题，并随时嘱咐了一些要注意的问题，接着就转过脸来对我们说：“这个公社的农科所就办在这里，青年们搞农业科学工作可带劲了，每逢墟日，就到墟上去办农业科学知识普及专栏，不久前还和商业部门结合，办了个腐植酸肥料展览室。”

小陈是个很有朝气的青年，他接着老曹的话说：“这不算什么。我们最近还有个计划，准备以农科所为基地，带动全公社，在两年内完成土壤普查工作，然后制订出《月子地区土壤改造实施方案》；在三年内基本上掌握全公社病虫害发生的规律；在五年内基本掌握全公社的降水规律……怎么样，曹书记支持吧？”

老曹笑着说：“这些我都在你们订的远景规划上看到了。不仅我支持，整个县委都支持！支持还不够，我们和你们一起来干，行不行？”

小陈满意地笑了，他陪着我们边走边说：“从老曹嘴里听到‘支持’二字，对我们来说已不是一次二次，也不是三次五次了。反正，一切成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县委、公社党委的支持下取得的！”

边说边走，我们已走上了一个小山丘。好家伙！满坡都是齐齐密密的桔树！有的树

上的桔子，已经长得有麻雀蛋那么大了。穿行在桔林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片诱人的黄澄澄的蜜桔，闻到了扑鼻而来的浓郁清香。只听老曹说一声：“主人来了！”抬头一看，桔树丛中钻出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憨厚地笑着，热情地向我们伸出手来。支部书记老郑说：“他叫张苍松，负责果园组技术工作。”我们要小张谈谈果园，他简洁地说：“今年桔子总产量可达五万斤，比去年增产一万斤。前年和贫下中农一起开垦荒山，干了一年，新种了蜜桔三千多棵，再过几年，新桔有了收获，产量就更高了。”

绕过果园，有一排房屋。老曹说：“这是养猪场。”还没进门，老郑高叫了一声：“晓玉！”屋里随着清脆的应声，跑出来一位年轻姑娘。老郑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这个陈晓玉啊，可是咱们的妇联主任，民兵副连长，又是有名的养猪场场长！”一番话说得小陈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

老郑说“有名”，果然不错，在来这里的路上，我们已听老曹和慰问团的同志介绍过，这位养猪姑娘每逢母猪下崽，总是守到深更半夜，有时还通宵护理，不辞劳瘁地使猪只只成活，头头健壮。不仅这样，过去有人总想把猪高价在自由市场出卖，自从小陈来养猪场后，坚持与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宁愿以只抵自由市场一半的价格卖给集体单位。但奇怪的是，过去卖高价，养猪场却一直亏本；现在价格卖得低，养猪场却反而有盈余。这是什么原因？原来她自己动手大搞青、粗饲料，大大降低了成本。

当我们请小陈谈谈她的事迹时，没想到她说：“这还不是接受再教育的结果！过去在上海读中学，有一次跟着老师去郊区公社参观，经过养猪场时用手帕捂着鼻子，老师批评我，我还争辩，说：‘你能说猪粪香吗？’”说到这里，她哈哈地笑了起来。在这爽朗的笑声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知识青年正在和旧思想决裂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笑了一通，陈晓玉说：“要说抵制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我还是向我们的团支部书记陈强学的。他是个拖拉机手，斗争性可强哪！过去这儿对那些思想作风不正的拖拉机手有这样几句顺口溜：‘没有酒，犁不透；没有烟，犁不到边’。可陈强呢，他每次去帮人家犁田，见面总是先‘约法三章’：‘一、我不抽你的烟；二、我自己带着饭；三、送礼我不收。’有人顾虑不请拖拉机手吃喝会影响耕田质量，但陈强干活却是那么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有时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才罢休，也不吃人家夜餐。附近队里的贫下中农都翘着大拇指说：‘这才是我们自己的拖拉机手！’”

我们参观完养猪场，又看了青年们的学习室。最后，陈晓玉他们一定要拉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宿舍。

宿舍就在学习室对面，一栋两层楼房，楼下住男青年，楼上住女青年，一人一间。我们走到楼上最末一间，主人不在，这个房间与其他房间不同，桌子上堆着不少书籍和文娱宣传资料，还有一些彩纸。陈晓玉说，这是故事员高海葳的房间。她和队里的另一个男青年周自强，与几个本地青年一起组成了故事队，自编自讲，在县、公社和其他兄弟单位，共讲达一百三十多场，听众四万多人次，有力地占领了农村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不久前他们在一个三级干部会上讲忆苦思甜的故事，曾感动得在场的许多干部流泪。

老郑补充说：“这些故事员，台上宣传先进事迹，台下自己以身作则。高海葳和周自



强,原来在工分值较高的果园队劳动,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为了尽快缩小综合场内各组之间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主动要求调到工分值较低的农业队去,我们已经批准他们去了。就这件事,其实也满可以上故事,可他们自己当然不会讲。”

我们一个房间接着一个房间地看过去,老曹、老郑和青年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每一间房子主人的种种事迹。听着听着,我们觉得看的并不是一间间宿舍,而是在看一批茁壮成长着的革命青年的群像。这些介绍如果要一一写下来,那是要占据很大的篇幅的。这一点,可只有请读者原谅了。但有一点必须在这里写一下。我们在这里最感到惊讶的是曹凤德同志为什么对这些青年这么熟悉?他谈着他们,就象在谈着自己的子女那样地了如指掌。他不仅讲得出他们的成绩,他们的成长史,甚至还讲得出他们每个人的脾性和习气。我们分明记得,刚才从县里到月子公社来,路上遇见了不少知识青年,他也几乎大多熟识……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老曹后来自己曾对我们说:“知识青年把一生交给党安排,我们各级党组织就要安排好知识青年的一生!”这是他们整个县委的认识,也是全县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口号。

为什么有那么多老贫农、老党员不辞辛劳地手把手教会了知识青年们种种农活?为什么一下雨总有人给知识青年送来干柴?为什么知识青年开发山林就有上千个贫下中农帮着赶修盘山公路?为什么原来准备外迁的青年都纷纷自觉地留了下来?为什么创办一个青年队总有成批的贫下中农挑着农具、牵着耕牛,甚至搬了自己家准备造房子的砖瓦来支援?——这一系列问题,都可以从定南县委提出的战斗口号中找到答案。

从月子公社回到县里,曹凤德同志又要到其他公社去为新集并的知识青年队看探地址,安排筹备工作了。这已成了惯例,不管哪个公社成立青年队,他都要亲自去看看是不是做到了既有山林又有水田,既有发展余地又离公路较近的要求。

我们一行中,有几位同志跟着老曹去了。我们两人留了下来,又仔细地阅读了一遍月子综合场青年制订的远景规划。经过现场参观,这下再看到“新一代人的决心”这七个大字,更感到了它们的份量和光荣。在这份焕发着青春活力的革命决心书中,倾注着多少老一代革命者的心血啊!

月子综合场的青年战友们,愿你们铿锵的誓言全都化作灿烂的现实!

## 七、深山宝库为谁开?

记得早年曾听到过一个“江西人觅宝”的民间故事:有一个懒汉种了一块瓜地,不肯辛勤垦种,到头来,只结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瓜,他正在生气,来了一个江西人,一定要用高价把这个怪瓜买去。种瓜人深感疑惑,再三询问,才知道这只怪瓜是一把可以打开深山宝库的钥匙。他照着那个江西人的嘱咐,深夜来到一座大山前面,把那只怪瓜朝一座石壁上的洞眼里塞进去,就象钥匙开锁一般,宝库的石门“咣啷”一声开了。走将进去,里面琳琅满目,珍宝无数。但他这样也舍不得,那样也舍不得,结果误了江西人给他限定的时间,鸡

叫了，天亮了，宝库的石门自动关住了，这个贪心的掘藏者和那无数珍宝一起，就被永远闭锁进了那谁也不知的深山岩壁之中。

但是，亲爱的读者，请你们不要感到诧异，这次我们在赣南山区，却亲眼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宝库。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从曹凤德同志嘴里听到，龙塘公社划出了八个生产队、五百多口人，办了个公社直属的墩上林场，准备将全公社的五十多名插队知识青年分三批集并进去，现在第一批十七名已进场。我们很想去看看，于是就翻山越岭地走了去。

本来，在定南县如果出门不戴草帽，太阳晒在头上真有点火辣辣地不好受。但那天我们在林场里走了十几里地，一路上浓荫蔽日，鸟语蝉鸣，凉气袭人。到场部稍事休息后，再向前走，林木越形茂密，约莫又走了二、三里，见到一个小山村，似乎已到了山的尽头，没想到跨过一座木桥后，峰回路转，一条石级山路出现在眼前。我们顺着这条路又翻过一座山，哟，这下才发现，我们置身在茫茫的林海中了！

四下一望，周围都是各种各样的树木，其间还夹杂着青翠欲滴的竹子。那些大树，有的高达二十几公尺，树巅似欲刺破青天；有的粗有二、三人合围，浓荫达半亩方圆之巨；有的合抱树木倒在地上，腐烂的树干上冒出了伞状的香菇和透明象水晶的白木耳。在这些树木中，我们能认得的是松、杉、樟、榆、枫、桐、核桃、板栗，还有许多树连见都没见过，不知道叫什么名称。好在林场党支部书记老郭和公社副书记老廖就在身边，我们一路走一路问，他们不仅介绍了它们的名称，而且详细地介绍了它们的用途：

“这是上等的建筑材料。”

“这可以做坑木。”

“这可以做家具。”

“这是做织布机上的梭子的。”

“这个做切菜的砧板最好！”

林木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记了这样忘了那样。各种不知名的花草遍地丛生，更是不及一一细问了。这里有着大量的珍花异草，是非常名贵的药材。我们在翻一座山坡时，就有一位场里的同志拔给我们看一棵既象草又象树苗的植物，长得挺古怪，有一根一公尺长的光秃秃的主杆，小指头那么粗，顶端有七片叶子排成一轮，正中间长着一朵淡黄色里泛现出绿色的小花。他们说，这叫“七叶一枝花”，是专治毒蛇咬伤的特效药材。他们还说，要是能碰到个老农，准能指给我们看很多很多珍贵的药材。

在浓荫密林中又翻越了四、五里山坡，终于来到了峰巅——林场的中心地区。可真没料想到，“白云深处有人家”——这里也有一个生产队呢！社员们是那样好客，劈剥的松柴煮开了清冽的山泉，泡上从本山茶树上采摘下的嫩叶尖，沏出了一杯杯浅绿色的山茗，端到面前，阵阵清香直往鼻尖里钻，瞧着已够惹人喜爱的了，何况我们正渴得很，一喝上嘴，那股味儿有多爽口就别提了。

主人在煮茶的时候，我们发觉他们的烧柴尽是些碗口粗的毛竹，旁边还堆着一段段水桶那么粗的树干，也是作烧柴用的。我们这些长住在大城市的人，从来也没见过这样名贵

的柴薪，禁不住流露出惋惜的神情。上海学习慰问团定南小组负责人李大健同志一眼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是有点可惜啊！但现在山区的交通还不是十分畅通，等到公路筑成以后，这些珍贵的竹木就可以运出去了。现在这里已经在筹办小工厂，正准备就地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呢！”

“在这深山老林办工厂，电哪儿来呢？”我们问。

“你没听见电的声音吗？”老李说。

老李真会说笑话，谁也没听说过电有什么声音。此地此刻，我们耳边除了蝉鸣雀噪，就是山溪的潺潺流水声和瀑布的奔泻声。

突然，这呼隆隆、哗啦啦的水声使我们一下子明白了：“你是说，用这丰富的水力资源发电？”

老李笑着点了点头，说：“这已列入公社和林场的规划之中了。”

喝完茶，疲劳消除了一大半，我们就继续攀登前面的另一座高山。这座山的林木较来处更其茂密，如果没有人领路，简直不知道脚步往何处跨下去。我们气喘吁吁地用手拨开密密层层枝叶，攀着毛竹、树干一直往上爬，好不容易登上了山巅。站在峰顶上极目远眺，四周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起伏的山峦连绵不绝，就象那树海中卷起了层层波涛，当山风吹过这千顷树海的时候，响声震耳，我们就更象置身在怒涛狂波之中了。

我们以为这里看到的是林场的全貌，但一问，支部书记却说，我们眼下的林海只是林场总面积的半数多一点，得翻上对面一座更高的山峰，才能看到林场的另一半。

我们望着对面这座高峰，可真有点望而生畏了。定睛一凝视，似乎看到那边山头上有一群人影在晃动。再仔细看下去，他们好象都拿着枪。

林场的同志见到我们疑惑不解的神情，解释说：“那里在打野牛”。

原来这山上到处有野猪、野牛窜跑，野牛比家牛小一点，同样有水牛、黄牛之分，跑起来很快，经常在林间乱窜。它们常常从树丛中探出头来，发现有人就拔脚飞逃。所以，只要一见竹丛灌木在奇怪地晃动着，就可以十拿九稳地估计到里面有野牛。捕捉的方法除了枪打，还可以用铁夹子。这种铁夹子的口子是圆形的，有几个尖刺，运用的是弹弓的原理，张着口子放在野兽可能经过的地方，上面还拴着条绳子，野兽只要一碰绳子，铁夹子就立即合拢起来，脚爪就被钳住了。去年冬天用这个铁夹子还钳到过一只小花豹哩！今天打猎队属于主动出击性质，主要是用枪打。

“要是对面山上看不清楚，把我们也当作一群野牛，这才有意思了。”我们开玩笑地说。

“千万请放心。他们非常注意安全，每次打野牛都要事先通知群众。这次知道你们来，昨天晚上就告诉他们到前面山头去围猎了。”主人也笑着说。

我们决定不进入前面的危险地带去冒险，就回走了。看着茂密的树林，听着喧闹的水声和不时传来的猎枪的响声，我们边走边想：那么丰富的山林资源，那么丰富的水力资源，还有那么丰富的动物、药材资源，这不是一个天然的大宝库是什么？

在这次参观过程中，我们好几次听到林场的同志提到天花公社的大云田农林场，说他们筹办这个林场是以大云田为榜样的。李大健同志也对我们说：“要知道这个场一、二年

后的情况,可以去看看大云田,那里也是知识青年的一个点,是一九七一年冬天两个生产队和一个公社养猪场合并成的。”因此,我们就决定第二天一早到大云田去。

大云田农林场的景致,有一部分与墩上林场相仿佛:林木茂密、品类繁多,颇带着原始森林的味道。但也有几大片地方却与别处迥然不同:一片整整齐齐、排列成行的杉树幼林,横看直看都是一条条笔直的线,每棵树的高度大约都是二公尺多一点。农林场的同志说:这是三年前新栽种下的。他们砍伐林木时采取的是“砍一片、造一片”的办法。

“这样不断地砍伐,会不会青黄不接,老树砍光、新树又未成材呢?”我们问。

“不会”,几个正在护林的上海知识青年说,“只砍不造,会破坏山林;不砍不造,拿不到一定规格、一定数量的木材,也不是个办法。如果有计划地把伐木和造林结合起来,不仅不会破坏林业资源,还能使林木越砍越多。”

一位高个子的知识青年看我们还是搞不明白,就让我们在几个树墩子上坐下来,给我们细细地算开了一笔账:

“这里杉木成材生长期是二十年。按我们目前的生产规模,每年砍造二百亩,我们林场的八千多亩山林要四十年才能轮转一遍,你说怎么会青黄不接呢?更重要的是,自然生长的林木,杂树比较多,缺少国家所需要的规格材。我们成片地种上杉树,更新林木,不仅便于管理抚育,还能使林木长得茂盛、整齐。这样做的结果,规格材将会成十倍地增加。因此,我们准备再集并一些青年进场,发展林场机械化,扩大每年砍造的规模和计划造林的品种,这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就会更大了。”

一个女青年抢过他的话头爽朗地说:“边砍边造是辩证法。我们不能消极地守旧业,得积极地创新业!”

“抓了林业,会不会影响农业,你们可是个农林场啊!”

那个女青年说:“这要看怎么抓。以前一些社员受了刘少奇、林彪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搞资本主义,刮单干风,上山乱砍乱伐,高价出售木材,结果不但糟蹋和破坏了林业资源,也影响了农业生产。现在我们遵照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有计划地安排好农业、林业,两者就能相互促进。林、副业的收入扩大了集体积累,我们用它购置了一批农业机械,粮食也增产了……”

那个刚才给我们算过账的高个子青年又给我们算起账来了:“农林场成立后的产量很能说明问题: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只有230斤,一九七四年上升到743斤,翻了三番。上交给国家的粮食、储备粮、社员口粮,也都成倍甚至几倍地增加,一九七四年集体经济收入比建场前原生产队增长了整整十三倍!”

这个青年肚子里有那么多笔账,我们估计他是个财会人员,一询问,竟然不是。他说:“干吗非财会人员才能记住这些数字呢?我们每个知识青年的心中都有这么一本账,账本上清楚地记载着这个农林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

当我们拾级下山的时候,不禁想起了那个开宝库的民间故事。宝库,并不是在人们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也不是在人迹不到的天涯海角,就在我们眼前,就在这千万知识青年

战斗着的地方，就在这党的阳光照耀下的万山丛中！这个瑰丽夺目的宝库，并不象传说中的宝库那样地石壁四封、狭小阴暗，而是下连万顷，上接青天，广阔无垠，气象万千。是的，在这里你看不到光彩夺目的珠宝，但却有着佳木参天、溪瀑竞流的景象。现在和不久的将来，这里正在或将要树起一面又一面的战旗，响起热闹的机器轰鸣声，新筑的公路上将飞驰着越来越多的汽车……而这一切，将使这里的林木资源化作比珠宝更为灿烂、更为珍奇得不知多少倍的财富，去装点我们祖国雄伟壮丽的社会主义大厦！

这个宝库为谁慷慨地敞开了它的大门？不是为企求侥幸的冒险家，不是为财迷心窍的掘藏者，而是为着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关怀下的革命的青年一代而敞开。奇怪吗？一点儿也不。他们手上正掌握着一把打开宝库的金钥匙呢，那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大有希望的。他们并不是去“进库取宝”，而是用自己的双手改造着、建设着、重新安排着这一座座天然的大宝库。请听大云田那个女青年站在高山上发出的响亮声音：

“我们不能消极地守旧业，得积极地创新业！”

这革命的青年一代，他们本身难道不也是一批光彩夺目的祖国的瑰丽珍宝吗？

## 八、沙 洲 坝

五月十五日，我们从定南县来到了瑞金。

瑞金，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首都。就象井冈山、延安一样，每提起它，总会使革命人民想起一部漫长而壮丽的中国革命史，激励起人们继续革命的斗志和信心。

当夜，我们在县委招待所听到了不少关于这个革命故都的介绍，上了一堂形象而生动的党史课。同时，还听到了不少关于在这里战斗着的许多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在这中国革命的摇篮里，风雷激荡的革命史斗争史正在延续着。两种介绍，两段历史，都使我们激动得迟迟不能入睡。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了沙洲坝的百花园生产队，看望钟志民和他的战友们。

钟志民，高高的个儿，结实的身体，理了一个平顶头，穿一身沾满泥土的布服。他从田里上来，把我们引进了他们集体插队班的学习室。他的事迹，读者们一定在报纸上已经读到过了。他原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冲破思想牢笼，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了彻底的决裂，于去年年初申请退学，经校党委批准，插队落户在这里。

大家都很忙，我们更不愿意占去小钟他们更多的宝贵时间，因此就开门见山地打开了话匣子。

小钟不太愿意多谈自己。他想得很远，想到的是自己整个一代战友们的成长。他说他曾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先后到附近五个公社去访问了不少青年队和青年班。调查的结论是这样的：大部分青年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健康成长，在农村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少数青年对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受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怕苦怕累，

不安心农村而羡慕城市生活。

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小钟经过调查后，和上海六十一中学的毕业生杨知伟，市西中学的毕业生王世亮等一起，创办了一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政治理论学校”，利用业余时间搞函授，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挤出放工后的时间筹办了一个杂志，叫《新一代》，以业余政治理论学校的名义出版。他们在这个杂志上开展了“为什么要坚持乡村，怎样坚持乡村”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不仅把参加业余政治理论学校的知识青年卷了进去，而且也吸引了整个瑞金县和赣南其他几个县的知识青年纷纷来稿发表意见。办一本杂志，谈何容易！乡办的同志告诉我们，小钟和小杨、小王他们为了搞好编辑工作，往往搞到深夜，而第二天却又去坚持出工了。

听到这里，我们的心头不禁一震。这是多么可爱的青年一代啊！毅然带头离开大城市、大学来到农村插队落户，迈开双腿到处搞调查，千辛万苦地创办理论学校，挑灯熬夜编辑杂志……总之，他们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伟大事业上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有这样的英雄儿女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参观了他们的编辑室——小钟的宿舍。一张简单的木床，墙上挂着一顶草帽和武装民兵的步枪，桌上、书橱里，满是马列、毛主席的著作和许多其他哲学、历史书籍，还有不少南京大学寄给小钟的学习材料。隔壁是别的青年的宿舍，除了书少一点，其余大致相同。这几间房子是那样普通，但却是全县许多知识青年十分注目的地方，他们在战斗生活中的体会、经验和成绩，他们对战友的鼓励、关怀和期望，从四面八方在这里集中，又从这里通向四面八方，……

好一个百花园生产队！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名称的来历，但却很想给小钟他们送上这样一副对联：

百花园里百花开，  
革命精神传万代。

当我们辞别这充满战斗气息的青年点时，小钟又补充道：“我们在调查中，深感要巩固上山下乡成果，除了青年自己必须提高认识外，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是很重要的。目前有少数干部对这项工作还不太重视，不够关心。他们忘记了毛主席在这里写的一篇文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很巧，离开了百花园，没有走上多少步路，就来到了当年的中央大礼堂。这是一个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八角形砖木建筑，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一日，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毛主席所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就是这个大会总结的一部分。我们坐在礼堂的凳子上，觉得毛主席亲切、宏亮的声音似乎至今仍在耳边回响。县乡办的一个同志说：“如果各级干部都能不折不扣地照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办事，那末，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慰问团的同志也对此作了补充：“信丰县有个虎山公社，原来党委对知识青年的工作有临时观点，住、吃、用、医、学习等方面都不够关心，影响了一部分青年的积极性。后来，公社党委认真学习了毛主席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光辉著作，统一了认识，就着手办青年队，还专门派了一个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去抓。为了选择青年队的地点，公社党委的几位主要成员，同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代表一起组成了一个‘三结合’小组，踏遍了公社的山山水水，最后，终于选定了终年流水不断、交通方便、既有水田又有旱地、既有山林资源又有鱼塘的沙子坝。青年队成立后，又开办了一些小工场。政治学习，革命大批判，文化活动，民兵训练都有专人负责，在那里，青年的精神面貌可好啦，不信，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参观完“中央大礼堂”，离不多远，就看到了那口著名的“红井”。毛主席住在这里的时刻，见当地群众喝水很不方便，就领着中央机关的干部和当地群众挖了一口井。红军长征后，群众在井旁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后来，国民党匪徒曾用刺刀硬逼着群众把这口水井填塞死了，还动手捣毁了井沿。但当地群众却一再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保护住了，填了又挖，捣了重修……

这个革命历史故事，我们早就听说过了，但现在亲身站在这口井旁，还是不由己地引起了心潮的阵阵起伏。这口井本身，就在默然地揭示着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所论述的革命真理。“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几十年来，我们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完成了多少艰难的革命任务，渡过了多少长江大河！今天，革命在继续，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应当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个革命传统，使革命的新生事物成长得快些，更快些。

现在，在赣南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就我们耳目所及，不正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遵照着毛主席的教导在战斗，不正有成千上万的干部遵照着毛主席的教导在工作吗？想到这里，我们觉得，眼前并不是一口普通的水井，它所喷涌的，不仅仅是晶莹的清水，这是毛主席亲手挖开的一个真理的泉眼，直到今天，还在滋润着几代革命者的心田……

## 九、追 记

五月二十四日，我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了赣南，离开了这些天来曾多次使我们深深激动的可爱而又可敬的人们。

回到上海以后，接到赣州地区慰问团负责人老杨来信，说五月三十日赣州地区在定南县开了一个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经验交流会。地、县负责同志，各级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干部和知识青年代表，还有慰问团、赣州军分区、共青团、妇联、农业局、林业局、商业局等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老杨他们还寄来了一包会议发言材料。这里有知识青年的许多发言，有各级干部的发言，也有地委负责同志的总结。透过那一页页充满火热言辞的油印材料，我们似乎又看到了赣南地区的山山水水，听到了许许多多熟识的声音；似乎看到了那一张张健康、乐观、充满了青春活力的笑脸，听到了会议召开过程中雷鸣一般的掌声……

会场的气氛怎么样，老杨没有详说。他只举了一个例子：会上，我们上面写到过的月

子公社综合场那些青年们一齐拥到台上，你说一段我插几句，作了一个十分热烈、生动的集体发言，台下所有的到会者都热烈地为他们鼓掌。看到这一群可爱的革命接班人，坐在主席台上的老红军战士、地委副书记宋志霖激动得流下了喜悦的眼泪。

台下的同志们看到台上两代革命者的感情如此紧密地交融在一起，就更加热烈地鼓起掌来……

宋志霖同志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在这次交流会后，却拄着根拐杖跑到一个个青年点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并要求各县把这项工作抓好。地委书记老田因病住院，没有参加这个交流会，但他在病床上还作了许多抓好知识青年工作的重要指示。

各县各部门的同志在会上的发言也是感人至深的。象全南县土产公司，为了帮助青年队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对青年进行了多种经营的辅导，而且主动提供种子和化肥，还支援了设备。这种坚决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革命态度，受到了参加会议的同志的一致赞扬。

刚刚读罢老杨的信，在上海又不断地听到了令人鼓舞的消息：

上海各有关部门组织了一个工业、商业访问代表团出发到赣南去了，准备与那里的县、公社和知识青年点挂钩，支持他们搞多种经营，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工交系统派出了技术辅导小组到赣南，去专门辅导那里知识青年办的小工场、小作坊，有的工厂还有计划地接纳了在各地插队的知识青年来厂学习，帮助培训技术人才；

团市委正在筹备组织工厂的青年工人去当地协助农村插队青年办好小工场，开展向农村插队青年学习的交流、慰问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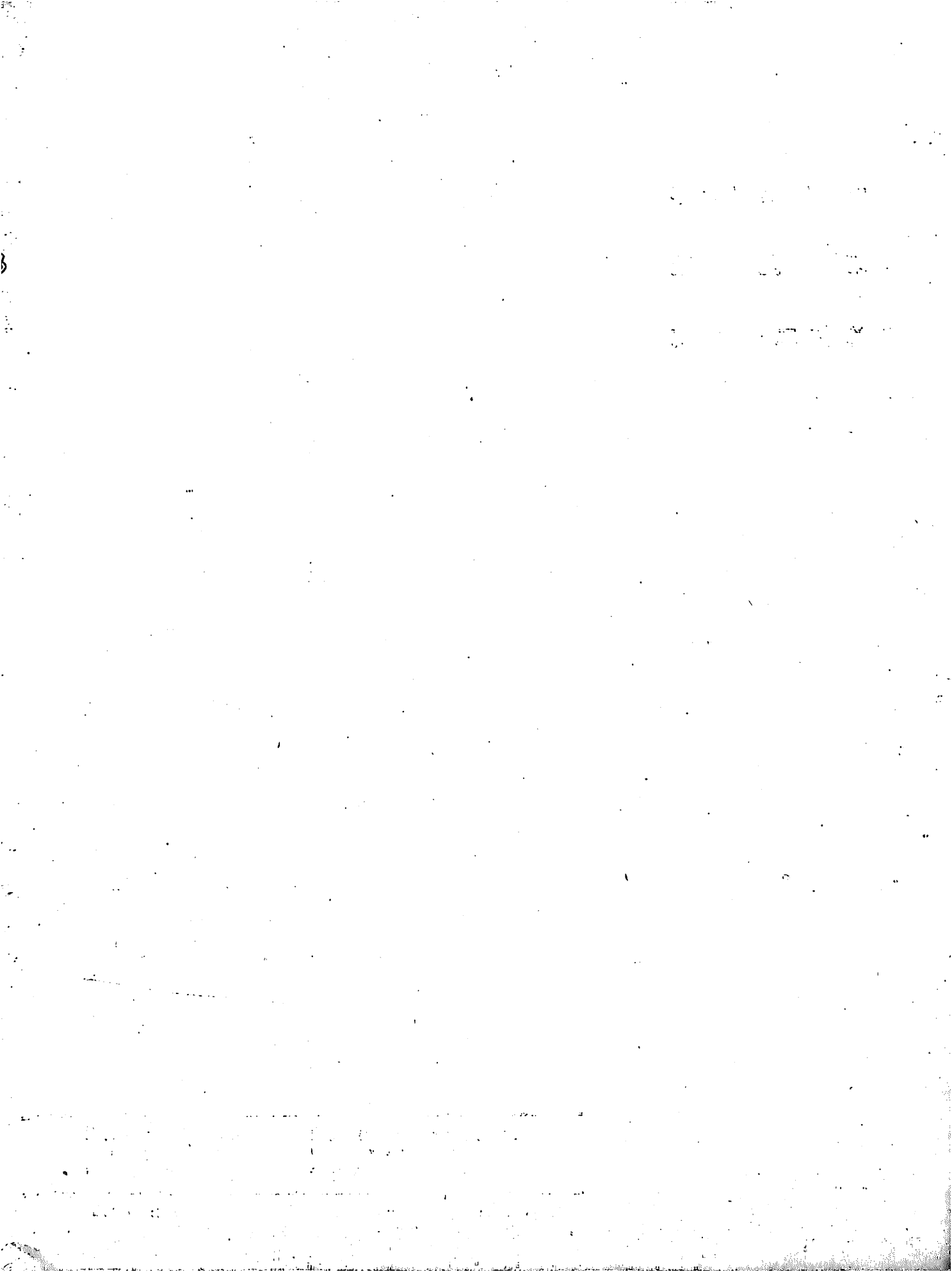
教育局准备尽快扩大函授点，赣南地区已列入他们明年的计划之内；

……

啊，赣南！我们现在已很难想象你两年后变化了的面貌；我们更难以想象那些熟悉的青年朋友们今后的成长速度。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伟大贡献的赣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一定能够作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的贡献。你不仅会向祖国献出那地上地下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财宝，而且，你一定能够象当年输送出大批红军战士一样，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输送出一批踏着红军足迹奋勇前进的革命接班人。自豪吧，红色的赣南！

愿我们两年后再见！

(续完)



一 九 七 五 年

第 九 期

总 第 二 十 五 期

XUEXI YU PI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代号: 4—192

定价: 0.25 元